

法西斯蒂的新工具——托洛斯基

樹樑編譯



大衆出版社

MG
D169
8



3 2173 8823 4

法西斯蒂的新工具——托洛斯基

樹 樑 編 譯

漢 口

大眾出版社

1938

751

法西斯蒂的新工具·托洛斯基

目次

編譯者序·····	樹 樑 (一——〇)
托洛斯基反革命的歷史根源·····	維 城 (一一——一四)
資本主義世界與托洛斯基派後備軍·····	馬魯伊奴斯基 著 (一五——三五) 樹 樑 譯
托洛斯基的失敗·····	Louis Fischer 著 (三六——四五) 基 譯
答覆托派對救亡陣線的訛蔑·····	亨 利 (四六——五七)
揭破托派降日攻蘇的陰謀·····	章乃器 (五八——六二)
給托派的公開信·····	魯 迅 (六三——六四)
評托洛斯基近著「革命的背叛」·····	P.S. Bruck 著 (六五——六七) 觀 璧 譯
日寇與托派之關係·····	吳 明 (六八——七四)

目次

二

托洛斯基叛國案審判記	宇炳然	(七五—一〇〇)
論蘇聯的軍事間諜案	徐冰	(一〇一—一〇八)
托派在美國及西班牙的罪行	吳明	(一〇九—一一四)
杜威委員會「審查」托洛斯基案的真相	Hammett & Smith 蓉 活 譯	(一一五—一四七)

編譯者序

史太林在六年前的「論黨史問題」的指導的論文裏嚴厲的指出托洛斯基主義已經不是勞動運動裏的一派思想，而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先鋒隊，過去的事實充分的證明了這個估計的正確，尤其是齊諾維埃夫和加米涅夫的賣國案更是觸目驚心的暴露了托洛斯基主義的黑幕，最近的紅軍首領的案件更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墨西哥——至今不承認蘇聯的國家——的在美國市僧學者杜威導演之下的托案假審的喜劇更露骨的表现出布爾喬亞學者的假仁假義，和托洛斯基的無恥的哭訴的醜態。在西方托派已經成了公開的法西斯蒂的瘋狗，在中國托派勾結日寇，企圖粉碎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在目下是公開的事實。

爲了民主和平，爲了中國的民族解放，反托洛斯基主義是每一個前進青年的不可避免的義務。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樹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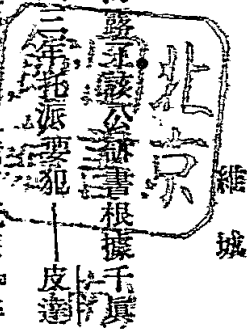
托洛斯基派反革命罪行之歷史根源

蘇聯總檢察長昨日公佈之公訴書，將托派叛黨賣國罪行，詳細揭發。該公訴書根據千萬萬確的物證與人證及被告者無法否認的自供而明白指出，在一九三三年，托派要犯——皮達可夫、拉迪克、索可里尼科夫、舍列布里可夫四匪徒，依照托洛斯基之直接指示組織「托派」平

行總部，與已被處死刑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斯密爾諾夫等人所組織之「莫斯科總部」同時並存，同時設立了許多進行暗殺暗害、偵探破壞及陰謀搗亂的小組，以進行暗殺黨政領袖，傷害優秀工人，搗毀經濟及國防企業等等的勾當，以期破壞蘇聯的國防力量，加速法西斯蒂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武裝侵犯，幫助侵略國搶奪及瓜分蘇聯之領土，推翻蘇聯之社會主義制度及工農政權，恢復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底專政。

從上述公訴書中，大家可以看得清楚，托派之卑污罪行，去秋及去冬已被蘇聯當局一再揭露，結果經蘇聯最高法院將該案要犯季諾維也夫等判處死刑，現在拉迪克等又以萬惡謀逆罪

托洛斯基派反革命罪行之歷史根源



被控托派悍戾若此實開千古未聞之奇局。但吾人稍一考察俄國革命歷史，就知道托派現今之卑污罪行，並非出於偶然，而是彼等數十年來叛賣理論及實際之必然結果。

遠在一九〇三年秋天，當列寧史太林所領導之布爾塞維克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即俄國共產黨的前身）第二次大會上與馬爾托夫所領導之孟塞維克，關於俄國革命運動一切原則問題，發生激烈的爭論時，托洛斯基即已為竭力反對列寧立場的孟塞維克「健將」之一。當時爭論的中心問題，是關於確定無產階級專政原理及建立統一集中之無產階級政黨。當時列寧認為：無產階級為要謀得本身徹底的解放和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領導廣大的農民羣衆，進行推翻俄皇封建制度的鬥爭，謀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以期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之基礎。而托洛斯基及其他孟塞維克，則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之能力，將無產階級專政解釋為資本主義和平發展之結果，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祇有在工人階級已成爲人民絕大多數和整個無產階級都是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的時候才有可能。由此可見，托洛斯基自始即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及無產階級革命

的可能。其次，關於建立統一集中的無產階級黨的問題，列寧認為這個黨應當是無產階級的先進的、組織嚴密的、紀律森嚴的、富有戰鬥力的、與羣衆密切聯繫的黨，列寧認為只有這樣的黨，才能夠組織、教育和動員無產階級去領導農民羣衆，共同爲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進一步爭取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托洛斯基以及其他孟塞維克則根本否認有組織這樣黨的可能和必要，他們企圖把無產階級黨變爲一切機會主義動搖份子的散漫團體，使其成爲自由資產階級的附庸和工具。他們這種立場，是與他們否認無產階級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有密切關聯的。著名的關於黨章第一條的爭論，便是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托洛斯基兩派立場上根本對立之最明顯的表現，同時也是這兩派以後長期鬥爭之主要的張本。總之，遠在布爾塞維主義最初產生之日起，托洛斯基及其黨徒歷來反布爾塞維克的叛黨賣國的罪行，就已有其歷史淵源了。

在第二次大會以後，列寧史太林準備工農羣衆去進行行將到來的一九〇五年革命，遂極力爲鞏固黨組織及羣衆組織而奮鬥，此時，托洛斯基却多方妨害布爾塞維克黨這種準備革命

的工作，掀起反對列寧的鬥爭，並特別發表各種攻擊列寧的論文，如我們的政治任務等等，謾罵列寧爲『專制的魔王』以圖破壞工農革命的領導和隊伍。可見托洛斯基此時之被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的名夢中稱爲『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者』完全不是偶然的。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開始的時候，列寧史太林及時規定了無產階級黨唯一正確的策略，俄國無產階級在列寧史太林領導之下，聯合着廣大農民羣衆，爲推翻專制政府，建立工農民主專政，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準備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而奮鬥。這時候，托洛斯基却用其所謂『不斷革命論』來與布爾塞維克策略相對立，否認工農民主專政的可能，提出其否認無產階級領導作用和否認農民革命作用的口號——『不要沙皇，政府是工人的，』這樣來搗亂革命的鬥爭，暗中幫助反動俄皇政府的統治。

當一九〇五年革命遭受暫時失敗和反動勢力橫行的時期，在革命同路人爭先恐後實行變節的時候，擺在無產階級黨面前的任務，就是要竭力保存和鞏固黨的祕密的組織，並利用一切公開可能以組織和教育羣衆去進行必然重新到來的革命。這時候，托洛斯基提出取消祕密

黨的口號，糾合一切叛黨變節的取消派份子，多方攻擊列寧史太林的布爾塞維克的組織，而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又從布爾塞維克內部進行破壞搗亂的勾當，充當卑污無恥的變節者托洛斯基反黨的內應。但由於列寧史太林及其所領導之布爾塞維克堅忍奮鬥的結果，孟塞維克托洛斯基及其同謀者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消滅布爾塞維克黨的企圖並沒有實現。

一九一〇年，革命的新高潮開始，客觀的環境要求無產階級先鋒隊更加強自己的組織。一九一二年正月，列寧史太林領導召集布爾塞維克布拉加臨時代表大會，驅逐了一切取消派托洛斯基及其同類，恢復和鞏固了所有一切地方的黨組織，建立了與羣衆更密切的聯繫。這時候，托洛斯基爲反對布爾塞維克布拉加會議，又糾合一切反黨的份子，在同年八月，召集了取消派的八月會議，因而組織了『八月聯盟』以與列寧史太林的布爾塞維克黨相對立。

在一九一四年爆發帝國主義戰爭，列寧史太林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立即揭露了各交戰國搶掠殖民地政策的內幕，並提出唯一國際主義的反戰口號，即『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這時候，托洛斯基、皮達可夫、加米業夫、布哈林等却提出了暗藏的擁護帝國主義

戰爭的口號，即所謂『不勝不敗』的口號，而加米業夫在一九一五年在俄皇法庭上的投降主義的供詞，更揭露了他們自己擁護帝國主義政策的罪惡。

一九一五年，當歐戰正酣的時候，列寧根據他關於帝國主義的學說，根據帝國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發揮了關於社會主義能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原理。列寧當時說：『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之不平衡，乃資本主義之絕對的規律，因此，社會主義最初在不多時，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獲得勝利的可能』（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三二頁）。此時，托洛斯基做了一篇標題為歐洲聯邦的專門論文，來反對列寧關於社會主義能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學說。托洛斯基當時說：『如果其他先進諸國不同時發生無產階級革命，那末，如果以為革命的俄羅斯可以抵擋得住保守的歐洲，或以為社會主義的德國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能單獨支持下去，那就是絕無希望的想法了』（見托洛斯基著一九一七年第八九頁）。托洛斯基這一個取消主義的，否認社會主義可在一國勝利的思想，正是整個托派以及一切反革命罪行之根本的根本。因此，遠在當時，這思想就已得到皮達可夫、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拉迪克、索可里尼科夫、布哈

林等人極力的擁護。

一九一五——一六年，在討論民族自決權問題的時候，皮達可夫、拉迪克、布哈林等人又掀起了反列寧史太林的鬥爭，公開否認民族自決的原則，否認被壓迫民族及殖民地國家民族解放運動之客觀的可能和必要。這種帝國主義的立場，是與他們暗中擁護帝國主義戰爭的主張有密切的關係。

當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發生以後，背叛民衆利益的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自動把工農政權交給了反革命地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列寧史太林根據當時的具體客觀環境，立即提出了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這時候，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皮達可夫、李可夫等人，却本着托洛斯基否認可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提出了反對革命轉變的主張，力圖實行和反革命臨時政府妥協政策。一九一七年八月，當時列寧因反革命臨時政府嚴令通緝，被迫避居芬蘭史太林依照列寧直接指示，召集和領導準備十月革命的布爾塞維克六次大會，在這次大會上，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皮達可夫、布哈林、李可夫及普烈布拉任斯基等人，

又根據托洛斯基一國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極力反對準備無產階級革命的方針，當然，所有這班觀點，都被史太林及其所領導之極大多數代表所粉碎了。不管一切機會主義的搗亂，布爾塞維克第六次大會，終於決定了具體的準備武裝起義的方針。

投機成性的托洛斯基，當一九一七年革命運動非常高漲時，暫時隱藏其反革命理論，而假意表示贊成布爾塞維主義，並請求加入布爾塞維克黨，但不久以後的事變，立即證明，托洛斯基在加入黨時，並未真正放棄其原有立場，他之所以混進布爾塞維克黨，祇是爲着在布爾塞維克黨內部乘機進行反黨的鬥爭。因此，以後在布爾塞維克黨及蘇維埃政權發展中，每一個困難關頭，托洛斯基莫不乘機搗亂，破壞革命事業。

十月革命前夜，當時機緊迫，武裝起義刻不容緩的時候，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却極力反對準備武裝起義的計劃，並在反布爾塞維克的報紙上，洩露準備武裝起義的祕密，這種臨陣脫逃和公開告密的工賊行爲，曾受到列寧史太林的無情打擊，同時，托洛斯基亦乘機多方企圖阻止武裝起義計劃的實現，而將要求武裝起義的問題「提交第二次蘇維埃大會討論。」

當十月革命不顧托洛斯基及其信徒之多方搗亂而終於在列寧史太林親自領導之下獲得勝利後，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索可里尼科夫等却要求撤銷列寧所擔任的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企圖將無產階級及貧苦農民已獲得之政權，交給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所代表之資產階級勢力。

在布列斯特和議的時期，當列寧史太林因根據革命環境要求，主張與德國簽訂和約以取得養精蓄銳機會以鞏固和保存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時候，托洛斯基、布哈林、拉迪克、皮達可夫等人，却多方阻礙和約之簽訂，企圖將蘇維埃國家命運，作孤注一擲。

在國內戰爭時期，當史太林依照列寧直接委任領導英勇工農紅軍，轉戰四方，固守要害，出奇制勝，屢敗敵軍，而觀點錯誤和不諳軍事之托洛斯基却多方阻礙史太林英明戰略計劃之實施。此時，列寧立即撤銷了托洛斯基的軍事指揮工作。祇是因列寧史太林之英明指導及瓦羅希羅夫、福龍芝、布留赫爾、柴泊也夫等名將之英勇善戰的結果，纔得打退外寇，肅清白黨，救年輕蘇維埃於危亡，奠社會主義建設之基礎。

一九二〇年冬，當蘇維埃政權必須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托洛斯基、拉迪克、皮達可夫、舍列布里科夫、索可里尼科夫及其同流，却極力反對列寧史太林所提出之經過新經濟政策和領導農民以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主張，故意掀起職工會問題的爭論以阻難新經濟政策的實施。

一九二三年，當列寧病重的時候，托洛斯基、皮達可夫、拉迪克、索可里尼科夫、舍列布里科夫及施米爾諾夫等人乘機挑撥黨員羣衆反對黨的機關，挑撥後起的青年反對老的幹部，以圖引起黨內的混亂和分裂。而在列寧不幸逝世，當史太林依照列寧遺囑，努力執行列寧遺志的時候，托洛斯基及其信徒拉迪克、索可里尼科夫等，更乘機加緊反黨鬥爭，並公開反對工業化政策，而要求在蘇聯實行道威斯計劃，並要求取消共產國際及職工國際等等。當時聯共黨在列寧繼承者史太林的領導之下，給了托洛斯基等以最大的打擊。

一九二五年，當布爾塞維克黨在列寧事業繼承人史太林領導之下，開始順利實行國民經濟之改造時，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及其同流更多方企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組織了所謂新反對派，而當彼等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遭受失敗後，立即與托洛斯基派聯合

起來組成所謂托季反對派聯盟，共同進行反黨及其領袖史太林的鬥爭，這托季反對派聯盟自開始活動之日起，即走上反革命的道路。當時，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拉迪克等人，對中國問題根據托洛斯基之所謂不斷革命論，竟否認中國有封建殘餘之存在及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剝削中國的事實，否認中國革命之反帝反封建的性質而稱中國革命的內容祇是爭取關稅自主，否認國共合作之可能與必要，這樣來企圖破壞當時中國民族革命的聯合戰綫，以貫徹其一貫擁護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的立場。

一九二七年，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開除了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派的黨籍，因為這時候，正如史太林所說：『托洛斯基主義已成爲全世界反革命資產階級底先鋒隊。』可是他們在被開除黨籍以後，不僅沒有放下自己反黨的武器反而實行採取歷史上少有的卑污欺騙陽奉陰違的手段，重新混入黨內及蘇維埃機關，繼續進行其危害搗亂的勾當，企圖阻礙和破壞社會主義勝利的建設。

在蘇聯共產黨加緊實行農業集體化，加緊向城鄉資本主義份子實行社會主義進攻和準

備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托洛斯基派的舊友布哈林、李可夫及湯姆斯基等右派份子又掀起公開反對社會主義進攻的鬥爭，提出『階級鬥爭緩和』及『富農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口號，並與托洛斯基反革命狗黨暗中結合起來。共同反對社會主義的改造事業。

因第一個五年計劃勝利實現的結果，社會主義在城市和鄉村都獲得了完全的勝利，所有托洛斯基匪徒，因感覺自己已失去任何社會的基礎，遂進而採取極端卑鄙的法西斯蒂的暗殺手段，以及陽奉陰違及陰謀害危的辦法，並將取得政權時割地賠款，斷送經濟命脈等爲條件，以勾結國外法西斯主義的勢力來向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政權作最後掙扎的鬥爭，以求達到他們的向來的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目的。

由以上簡略的敘述中，便可知最近幾月來蘇聯政府所揭露出來的托洛斯基派之駭人聽聞的賣國罪行，乃是托洛斯基派一貫反革命理論及實際所演進之必然的結果，在十月革命以前，他們因否認無產階級革命有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可能，曾多方搗亂俄國無產階級及勞動羣衆奪取政權的鬥爭，而在十月革命勝利初期，他們因否認俄國十月革命之社會主義

性質，及在蘇聯能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前途，曾力圖使無產階級交出已經奪得的政權，並多方阻礙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而當社會主義已在蘇聯完全勝利和蘇聯全體人民已達到快樂幸福生活的時候，他們却力圖恢復已在蘇聯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被推翻的地主資產階級政權，而他們爲了達到實行恢復資本主義的目的，竟不惜以變社會主義的蘇聯爲殖民地爲條件，以勾結世界一切反動勢力，協助日德等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和瓜分蘇聯領土計劃的實現，並預先約許將烏克蘭割給法西斯的德國，將東海濱省一帶廣大土地讓給日本帝國主義，並贊助日本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在蘇聯國內，他們却充當德國密探局的走狗，企圖破壞蘇聯一切經濟命脈，特別是關係國防的企業，企圖殺害蘇聯人民愛戴的領袖及優秀份子，並實行殺害了蘇聯人民最戴領袖之一——基羅夫及不少斯塔漢諾夫工人，這種出賣祖國，反對人民的萬惡罪行，實開人類史上所未有之奇局。

說到這裏，我們便聯想到中國的托陳派狗黨之卑鄙的漢奸行爲，也如他們的魁首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業夫、拉迪克、皮達可夫等狗黨在蘇聯所進行的罪行一樣，他們在中國替日

本帝國主義效勞，阻礙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破壞抗日團體，充當日帝偵探，逮捕愛國份子等等惡行，這同樣不是偶然的而是整個托洛斯基主義一貫反革命系統的運用。

同時，托洛斯基派匪徒不僅是蘇聯全體人民的死敵，而且是全世界以及中國全體人民的公敵，因為這些匪徒，是全世界法西斯蒂勢力的走狗，是挑撥戰爭和危害和平的罪魁，例如在西班牙當全國人民一致團結反對法西斯叛亂將軍的時候，托洛斯基派却甘作法西斯蒂走狗，破壞人民戰線的團結，反對正在和法西斯賣國將軍及德意法西斯強盜作艱苦鬥爭以保衛國家獨立和民主自由的人民戰線政府。在法國托洛斯基匪徒，與德國法西斯暗探局勾結洩露本國的國防秘密，破壞人民統一戰線，並企圖暗殺最努力於人民戰線的共產黨領袖嘉善等。至於托洛斯基派在我們中國的漢奸罪行，那更是有目共睹，人神共憤的事實。因此，全世界以及整個中國人民，對於蘇聯此次所破獲的罪惡滔天的托洛斯基狗黨，將與全體蘇聯人民表示同樣的義憤，而對於蘇聯最高法院嚴厲處決這些死有餘辜的狗黨的辦法，將與蘇聯人民表示同樣的歡迎。

資本主義世界與托洛斯基派後備軍

樹樑譯自 Rundschau 五月號

馬奴伊魯斯基著

Kamerad Stalin 在最近的聯共中委全體會議上對於我國的不關心資本主義世界的態度給與了警告，他特別請求大家不要忘記：現在社會主義只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得了勝利，在其餘的六分之五的地方，是資本主義的狀態統治着，政權是在布爾喬亞的手裏，他們想消滅社會主義，並且在蘇聯重新恢復資本主義，不然的話，至少阻止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秩序的進展。

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的鬥爭——在這兩種制度並存的限度之內——是不會中止過，將來也不會中止的。歷史告訴我們，任何階級都不會自動願意的讓出他們的位置來，舊社會的防守者對於新興的社會秩序不做最無情的鬥爭，而讓出他們的位置，是沒有的。對於社

會主義，特別是如此，因為它要根本變革人類整個的經濟的社會政治的狀態。榨取階級不只是動員他們的學者，出版物，教會，用宣傳的方法來和社會主義對抗，他們也用暴力破壞工人運動，消滅他們的組織，用恐怖和收買的手段，使得人民大衆離開爲了社會主義的鬥爭。

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熱病一般的武裝海陸空軍，不只是爲了他們彼此之間的廝殺，實現他們的帝國主義的貪慾，而且想挑撥戰爭，來粉碎他們所痛恨的蘇聯的社會主義秩序，奴隸蘇聯的國民。可是資本主義國家當中的一國，在世界大戰得到了勝利，雖然仍然保持着布爾喬亞的議會主義的秩序，因爲恐懼他的不平穩的法西斯蒂鄰國，對於和蘇聯共同努力和平的工作表明某種程度的熱心。另一種類的國家，法西斯蒂形態的國家，懷抱侵略的野心，雖然他們不一定能夠實現這種企圖。法西斯蒂國家現在沒有公開的向社會主義國家宣戰，決不是因爲他們甘心讓社會主義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地方得到勝利，而是因爲法西斯蒂國家的狂暴的侵略的野心，惹起鄰近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疑懼，可是主要的是因爲蘇聯軍備的強化，和害怕他們本國的人民。

資本主義老早就想用他們的鎗刺的來向蘇聯探險了，我們能夠忘記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內戰爭時代的武裝干涉嗎？雖然這個發起人沒有得到勝利，可是內亂延長下去，人民大眾的痛苦加深，迅速的社會主義建設更加困難了。我們能夠忘記這些國家武力援助台尼金，高爾恰克，烏蘭格爾這些反動將軍，派遣遠征軍到蘇聯來，佔領蘇聯土地的一部嗎？我們能夠忘記日本干涉遠東，德國佔領軍統治烏克蘭，外國軍隊從南方或北方馳聘於瓦爾加河岸和西伯利亞嗎？這些干涉都失敗了，這是因為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派遣軍不願意和蘇聯的工農大眾作戰，這是因為大戰把這些國家的人民弄得精疲力盡了，他們並且反對這種干涉；在另一方面，蘇聯的工農大眾在對抗外國的侵略上表示出英雄主義的奇蹟。

我們能夠忘記，在一九二〇年資本主義政府唆使波蘭軍隊襲擊蘇聯的戰爭嗎？我們的敵人沒有獲得一點結果，可是他們加深了被帝國主義的和國內的戰爭及侵入所造出的經濟的混亂，我們不能不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並且製造出許多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再建時期的困難。

干涉和波蘭戰爭的終結，呈現出國際形勢的變化，這是說資本主義世界放鬆了蘇聯了嗎？資本主義政府不得已暫時放棄他們直接用武力的襲擊來消滅蘇聯的計劃，可是用另一種方法來繼續，資本主義國家先後承認蘇聯，但是這並不妨害他們在此後的這些年來織成外交陰謀的密網，使蘇聯孤立起來，儘可能的擴大蘇聯的許多新的內憂外患。這種外交陰謀是隨伴着潛行的惡事的，公開的戰爭是被這種隱藏的戰爭代替了。

資本主義國家向蘇聯派遣武裝匪黨，他們襲擊地方的行政官署，暗殺黨和蘇維埃的官吏，破壞鐵路，切斷電話及電報線，火燒兵工廠，破壞蘇維埃的財產，煽惑民衆。在中央亞細亞被英國陸軍上校噉使的巴斯馬欽，在烏克蘭被波蘭間諜象養的佩魯猶拉黨，日本參謀本部由滿州派遣的紅鬍子，芬蘭派遣的加烈里白衛軍，在和平時期做無恥的活動，好像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作着戰似的，我們能夠忘記資本主義對於蘇聯的這些血腥的犯罪的連鎖嗎？

蘇聯能夠忘記資本主義世界的隱藏戰爭的另一方式的破壞工作嗎？外國資本的卑劣的代理人用水淹沒鑛坑，製造營業上的災難，弄壞發電所，損壞貴重的外國機器，使多數人犧牲於

爆破，故意的擬出不能實現的或是過高的或是過低的估計的方案，這些都是在工人充滿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拚命的工作着，而且造出工業生產的世界的紀錄的時候發生的，這不是很明顯的，如果沒有資本主義國家的顛覆運動，社會主義建設戰線上能有更大的結果嗎？資本主義國家在被革命摧毀了的禽獸一般的貴族、商人、大地主、主教の子孫裏招募他的代理人。

我們沒有忘記資本主義世界的權利，正因為最近幾年來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發展了法西斯蒂運動，歐洲法西斯主義的第一個浪潮是在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剛剛告終，法西斯蒂主義在意大利獲得勝利的時候；第二個浪潮是在一九三三年德國法西斯蒂掌握政權的時候。緊接着德國法西斯蒂，在奧國採取護國團的形式獲得了政權，一九三四年二月六日法國開始了法西斯蒂運動，捷克斯拉夫展開了亨萊運動，比利時則有德古萊利運動，英國有毛斯萊運動，羅馬尼亞的鋼鐵隊大肆活動，法西斯蒂在斯干紀那維亞各國活躍着。

這個國際工人運動和蘇聯的死敵法西斯主義的發展是有什麼意義呢？這是表示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的對立特別尖銳化，在統治階級當中最瘋狂的保守主義者，對蘇聯戰爭的

主持者占了優勢，對蘇進攻的領導權移轉到法西斯國家的手裏，資本主義世界對蘇襲擊的危險更增高了。在法西斯蒂運動日益增高的時候，在蘇聯只有他們的最薄弱的基礎，我們應該利用這種情形，對於資本主義世界，表明最大的警戒。

爲什麼我們恰好在這最近的期間，開始忘卻資本主義世界呢？原因是：我們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偉大成功的印象之下，開始把資本主義世界侵略我們的力量和可能輕視了。在急快的速度之下發達了社會主義工業，全國充滿着鋼鐵和花崗石，集體經濟強化了，生活改善了，愉快了，消滅了產業工人和集體農民的界限，蘇聯國民變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的統一的家庭，羣衆的社會主義意識發展了，我國的國防日益增強，蘇聯人民的能力的自覺和祖國愛同時提高，全世界的被搾取者和被壓迫者對於工人的祖國的熱愛也擴大了，根據這些，蘇聯人民得出這樣的意見：一切的困難都克服了，所有的暗礁和沙洲都避免了，危險都沒有了，資本主義世界的侵略是不成問題的。

可是這種情勢是不能忘掉的；蘇聯的一切偉大成功是與世界經濟危機同時發生的，這危

機甚至動搖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基礎；在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暴風雨一般的向前進展，資本主義國家則向後倒轉。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經濟危機最深刻的時期，資本主義的企業迅速的惡化了。雖然資本主義世界甚至克服了最危險的一點，可是很困難的社會政治的結果，仍然在廣大的範圍內起着作用。由此得出這樣的意見：資本主義已經走到末路，是條死狗，剿滅社會關係裏的資本主義的巢穴已經不費什麼困難了。

在資本主義國內的前衛黨的戰術上，這種見解造出對於法西斯蒂的危險的輕視，許多德國××主義者，在法西斯蒂開始攫取政權的時候說：法西斯主義的發展已經到了限度，法西斯主義已經敗北了。這種輕視資本主義的能力和可能的見解，是和那過高估計資本主義的能力的錯誤到極點的「組織的資本主義」的投降理論是一樣的可恥的。這樣輕視沒有乾枯的資本主義的可能，不但忽略了對於法西斯蒂主義的警戒，而且因此輕視戰爭的危險；資本主義已經到了最後了，他用什麼來打仗啊！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日暮途窮，用什麼來打仗啊！資本主義秩序的內部已經腐爛不堪，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只要一拳就可以除掉它的。

然而這種見解是錯誤的：第一因爲忘記資本主義是一個歷史的註定沒落的制度，它的一切發展路線在事實上是走向更惡劣的狀態上去，不可避免的消滅，雖說如此，資本主義是曾經暫時改善過，現在正在改善中，將來也會改善的，只要舉出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情勢的重大的改善來就夠了。在許多國家裏，生產不但達到了一九二九年經濟危機前的程度，甚至有的國家超過了它，這並不是說排除了新的經濟危機，恰恰相反，正是新時危機的前提，可是在目前，經濟的復活是一件無可爭論的事實。

這個錯誤的第二點是：資本主義的地位越混亂，它越強烈的想在戰爭中找一條脫離危險的出路；正因爲法西國家的地位危險，所以這種國家對於軍事冒險的傾向越強。沙皇主義是在日俄戰爭中延長它的沒落！日本爲了解決內部的矛盾和中國開戰，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爲了解決國內的困難，才侵略阿比西尼亞德國法西斯主義想撥發戰爭，好藉此免掉破產！

蘇聯的和平政策的結果，使得蘇聯國民很安靜，蘇聯的和平政策是最徹底的和平政策，因爲他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廢除了一個階級榨取一個階級，一個階級壓迫一個階級的制度，沒有

佔領土地和帝國主義的野心產生的餘地。這種和平是成功的，因為這種政策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和一部分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第一，有些列強，擁護這種政策，因為他們對於世界的再分割感到興趣；第二小國擁護這種政策，因為他們不願意在新的戰爭中喪失他們的獨立；第三，有的國家害怕戰爭的結果會引起革命。

蘇聯和平政策的成功首先是因為適合各國人民的願望，而被鞏固了。他的和平政策在原則上是和布爾喬亞的議會主義的政治派和政黨的和平政策不同的，他們雖然不願意戰爭，可是究竟是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這樣蘇聯的和平政策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裏找到最廣泛的擁護，他們有充分的權利，在蘇聯看到最可靠的民族間的和平的堤防。

只有依靠全世界的人民大眾的擁護，蘇聯國民對於國家的熱愛，社會主義社會秩序的繼續發展的力量，光榮的紅軍，蘇維埃政府才能夠阻止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法西斯蒂攻擊者挑發一個新的巨大的戰爭。在最近幾年來，不止一次和平的狀態，瀕於危殆，不止一次，日本軍閥和德國法西斯蒂挑撥戰爭，如果蘇聯不是那樣堅忍的忠實於和平的話，戰爭早就爆發了。主要的

如果蘇聯沒有那保護工人祖國的武力的話，這種戰爭的遲延是不可能的。由此蘇聯國民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已經有給法西斯蒂的攻擊者一個嚴重教訓的可能，並且能夠遏止他不做第二次第三次的挑戰。蘇聯政府指導下的和平是維持着的，將來也是會維持的。戰爭的危險的尖銳的認識是減弱了。大家不注意：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不是單由蘇聯來決定的，寧可說是由蘇聯會向他們提出和平提議的那些國家來決定的。可是這些國家表示不願意和平，在牛倫堡大會的希特拉和戈貝爾的瘋狂的歇斯特的演說，不是表明蘇聯是在和這樣的對手來交涉和戰的問題嗎？難道說蘇聯政府沒有向日本提議過簽定不侵犯條約嗎？日本政府不是拒絕了嗎？蘇聯政府沒有向國聯提出廢止一切軍備嗎？各資本主義國不是都拒絕了嗎？

有人舉出西班牙爲例。全世界都知道西班牙政府利用了一切可能，不使德意的侵略者有機可乘來攻擊西班牙國民。然而，德意法西斯蒂政府沒有任何表面上的原因，沒有任何的宣戰就侵入了西班牙。

有人說：西班牙國民的英勇反法西斯蒂鬥爭已經驚醒了法西斯蒂政府的迷夢，古阿達拉

雅拉是一個堅固的德意侵略者的戰火的彈壓者，在和武裝的人民衝突之後，確證了法西斯侵略者在正式的戰爭上的準備的不充分，和法西斯蒂政府內部的無力。干涉者的軍事上的失敗，喚起了本國人民的不滿，不但在德意兩國，就是在波蘭人民大眾開始熱狂了起來。在日本也是不安定，暗殺長官，部分隊伍的譁變，甚至保守政黨的代表者也因為國內的深刻的而不滿而攻擊政府。由此得出這樣結論：法西斯蒂政府在國內的後方不安定的時期，不會開始戰爭，並且也不能夠開始。

這是錯誤的，法西斯蒂政府背後的不安定，在目前說來還沒有達到使戰爭不能爆發的程度。在這樣的後方開始戰爭，繼續戰爭，但是在這樣的後方是不能勝利的，戰爭會被人民來終結，在這時候，他們是要除掉他們的政府的。

有人說：法西斯蒂運動在最近的幾個月以來，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內很平靜，西班牙人民的勝利給與了法西斯主義的聲勢一個嚴重的打擊，很有力的援助了反法西斯蒂運動的進展。這種觀察是對的，然而由此得出戰爭的危險因此減少的結論是錯誤的，因為戰爭是擄取階級強

化反動的方法是推動法西斯蒂運動的方法。

二

現在整個國際的情勢呈現尖銳的新的戰爭的準備的徵候。資本主義特別是法西斯主義各國軍備的擴張說明了這點。資本主義軍隊的技術上的改換，法西斯蒂國內一般人民的兵士化，自足自給的經濟政策，法西斯蒂偵探的活躍，最近暴露出來的托洛斯基派的無恥的間諜活動都說明了這點。

好幾年以來，托洛斯基派就和法西斯蒂在政治上合作了，這是一個祕密的聯盟。有銳利的政治眼光的人，只要比較一下他們對於蘇聯狀態問題的政治立場，對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工人運動的統一戰線問題，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及法西斯蒂運動和人民戰線的問題的立場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了這點。普雅塔訶夫及其徒黨的審判指出在托洛斯基主義與法西斯蒂主義政治合作的背後隱藏着一個更大的陰謀，這就是：在托洛斯基直接和法西斯蒂領袖的協定上決定托洛斯基反革命組織的幹部應該舉行反蘇聯的破壞工作。這個審判指出托洛斯基主

已經變成法西斯主義的間諜和代理人。

歷史知道很多可怕的變節者和無恥的叛變者的例子。墨索里尼在沒有做法西斯蒂運動的領袖以前是意大利社會黨的左翼的一員，皮魯茲斯基曾經是波蘭社會黨的領袖，法國法西斯蒂海爾甫是「比較明顯的」反軍國主義者，在一九〇七年第二國際的斯透加爾特會議上提議過工黨在戰爭宣佈時應該用革命來回答它。雖說如此，在範圍的巨大上，托洛斯基派的叛變在這些種類當中是有獨自的特色的。

只有在資本主義腐爛的時期，布爾喬亞才最狂暴的摧殘工人運動，反對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只有在法西斯蒂的反動最狂暴的時候，這種叛變才會成熟。有名的托洛斯基派的「克利猛叟決議」指明托洛斯基主義是向怎樣的路線進展。恢復資本主義的綱領，需要托洛斯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接近，因為托洛斯基派在國內找不到助手，只好求之於國外。因此托洛斯基及其黨徒和日本的軍閥德國的法西主義結成同盟，可是只有允許割讓領土給法西國家才能締結這種聯盟。因此托洛斯基訓令他的代理人破壞蘇聯托洛斯基看到要動搖蘇維埃政權是不可

能的，因為它受蘇聯人民無條件的擁護，因此只好引入外患，採取使蘇聯敗北，法西國家得勝的路線，因此就做恐怖的工作，破壞的工作，根據聯盟者的訓令的偵探工作，他們毫無信義，只做卑污下賤的工作，禽獸一般的攻擊和仇視社會主義，托洛斯基主義已經跌落到反革命匪賊主義的糞坑裏去了。

國外的白衛軍早就走上同樣的路，他們每人都担任資本主義世界的偵探工作。沒有一種狗鄙的事情，這非人類的腐敗的白衛軍無賴不肯去做獻身的努力的。在上海做日本的偵探，在羅馬尼亞的紀古蘭查拷問××主義者，在德國偽造××國際文書，在英國挑怒工人，他們組織恐怖的暗殺，甚至暗殺法國的總統，他們偷竊美國國防的祕密文書，只要嗅得到人血的地方，都有他們的足跡。

托洛斯基主義是已經走上這條路，在他們的手上染着我黨的寵兒的血，優秀的工人政黨的領袖洛夫是由外國偵探的指令暗殺了的，許多工人都被有計劃的爆發的破壞工作沉入血海。在他們的罪惡簿上是記載着向法西斯蒂報告的化學工業的狀況，西伯利亞鐵路的運轉

能率，托洛斯基主義把噤舌，說謊和騙人，偽善主義構成一個體系，很顯然的他在這樣的賣國工作上，只有在解體了的反革命的榨取階級的無賴當中找到助手。

可是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托洛斯基主義的背景是誰呢？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沒有多少他們的擁護者，他們都是小團體，小黨派，沒有大眾的基礎。能夠接受托洛斯基派的反蘇聯反×××的宣傳的人，法西斯主義早就招募了他們。然而在一「指導者」——「激流」這些小團體裏是生產過剩的，夢想急速的在政治上榮達的冒險份子都跑進去，他們不歡喜工人組織，因為在那兒有團體的紀律，在×××主義運動裏，因為無恥，卑劣，勾接警察，和煽惑而被開除的人物都擁到托洛斯基主義這方面來。政治上的惡漢。祕密警察，在雜色的混亂中改換名目，在意識形態上是朝三暮四，可是都有着法西斯蒂的拳頭和鼻子。

然而問題不是在於這些小團體，而是在於誰是他們的背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托洛斯基主義沒有擁護者，反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托洛斯基主義的背後站着反動主義者大半是排外主義者，大多是金融資本的帝國主義的份子。藉着這種引線，托洛斯基主義踏入帝國主

義的國家。整個法西斯蒂出版物替托洛斯基大吹大擂。有名的美國的法西斯蒂新聞公司Hearst有托洛斯基的專門版，可恨的無恥的托洛斯基的書由最反動的書店出版，廣汎的散佈出去，托洛斯基走近希特拉，因為想利用他來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

托洛斯基主義者由法國的叟伐利同類反映着法西斯蒂德利歐和拉庫然而在叟伐利德利歐和托洛斯基的背後也和拉庫和希特拉一樣站着金融資本。因此托洛斯基主義在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工人運動是比在資本主義已經消滅了的我國有更大的危險。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托洛斯基主義對於工人組織的危險，因為他們叫賣「左傾」的空談，有惡化一些急激份子的可能，所以更加重了。

很明顯的托洛斯基主義沒有爲了反蘇聯和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來煽惑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的可能，這是托洛斯基主義的致命傷，關於這點法西斯蒂的混蛋們很清楚的看到；可是由「左面」來對統一戰線和人民戰線下最無恥的批評，托洛斯基主義比較容易找到同志。所以需要加緊暴露托洛斯基派的挑撥的活動，因為這是幫助法西斯蒂粉碎工人運

動的企圖的。

有人舉法國爲例。在那兒工人階級自去年夏天的幾次重大的罷工運動以來，在改善生活上得到了很豐富的收穫，他們除去小的讓步不算，從布爾喬亞手中爭取了增加工資百分之三十——在仍然繼續着的法國經濟危機之下——一禮拜四十小時工作，兩禮拜付工資的放假，團體協約，工人管理員的選出。自那以後，法國布爾喬亞非常激怒，他想把工人的收穫只少奪回一部份，因此他採取直接的挑戰，他努力煽惑一部份工人去佔領工場，把小部份的工人各各擊破，然後再藉口「無政府」來封鎖工廠，強制他們服從以前的勞動條件。

誰幫助法國布爾喬亞來實現這種犯罪的計劃呢？是托洛斯基派。他們和企業的代理人在一起來分散工人，挑發無組織的行動，給與企業家有破壞他們簽過字的合同的可能。

另外的例子是法國社會黨，即被法國政府禁止了的武裝法西斯蒂團體的第二版。現在工人羣衆熱狂的要求逮捕德利歐和拉庫，和禁止法西斯蒂黨，這種要求是合法的；可是法國布爾喬亞想無論怎樣也要保持法西斯蒂組織，而想禁止××黨。全體的法國的反動派拚命的煽動，

要和X黨作流血鬥衝突，他們所以需要衝突的是因爲想藉此打破人民戰線的統一，孤立X黨，把小布爾喬亞和農民當中的動搖分子奪取過去。在這兒托洛斯基派是和法西斯蒂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他根據德利歐和拉庫的指令，和法西斯蒂的挑撥者在一起煽動武裝的衝突。他們和法西斯蒂及法國警察在最近的巴黎郊外的事件上挑撥過衝突，工人死傷者極多。

現在誰反對法蘇協定呢？希特拉、德利歐及和他們聯合的法國反動派當中的最保守的人們。爲了和那鞏固和平的條約對抗起見，法國的反動派和希特拉發生諒解，這是有利於戰爭的。

托洛斯基派在西班牙也扮演法西斯主義的助手和代理人的角色，誰都知道西班牙人民戰勝叛變的將軍和德意干涉軍的前提，是鞏固人民陣線的統一。弗朗哥的代理人拚命的大衆面前破壞人民戰線的信用，從內部來分裂，使戰鬥的西班牙人民墮落，在政治上解除他們的武裝。今天他們嗾使無政府主義者和X黨衝突，明天又去試驗着使巴斯克族民族主義者脫離人民戰線，挑撥社會主義者間的衝突，沒有窮盡的散佈謠言，謊話和中傷，在這兒托洛斯基派也不會閉着，他們死命的幫助弗朗哥，用無恥的攻擊人民戰線和挑戰的行爲來破壞人民戰線。

的統一。

人民戰線的所有的黨和組織爲了統一的人民軍隊，解消單一的黨派集團而鬥爭，因爲這是妨害統一的戰鬥工作的。可是弗朗哥却是希望政府軍裏有無組織的義勇兵，需要訓練不足，混亂與無秩序。托洛斯基和「第五縱隊」的代理人攜着手，用在後方和軍隊裏的破壞工作來促進弗朗哥將軍的卑劣的計劃。

德意干涉軍爲了辯護他們對於西班牙人民的戰爭，大喊在西班牙進行着「××主義革命」，國際軍站在西班牙人民方面戰鬥，××國際要「吞滅」西班牙希特拉的代理人托洛斯基派也隨聲附和，布爾漢司和沙拉曼卡的法西斯蒂報紙滿載着托洛斯基派的論文，在形式上和內容上是和弗朗哥將軍的論文是沒有區別的。

在中國雖然有××領袖當中的最反動主義者的反對，用最大的辛苦建立了抗×民族統一戰線，托洛斯基派作爲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最可恨的敵人而登場了，他們援助日本，日本是想破壞中國的統一從中取利，更佔領其餘的土地。

反托洛斯基鬥爭要求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表明極大的警戒，因為托洛斯基主義擔任法西斯蒂主義自己不能擔任的特殊任務，他們想物色急進化的社會民主主義工人，企圖把他們引誘到反革命的仇視蘇聯的路上去。最近又在無政府主義團體裏作熱心的活動。侵入社會民主黨左翼，在裏面找些同志。在法國是半無政府主義的團體，在西班牙是人民工會的無政府主義份子，在英國是獨立勞動黨，在比利時是社會主義青年隊，在美國是社會主義黨都有這種傾向。那是很顯然的，托洛斯基主義能潛入的團體和組織不可避免的要分裂成小黨派，把它變成離開羣衆的宗派。最新鮮的例子是英國獨立勞動黨，特別是美國的社會主義黨，他在最近兩個月黨員由一萬六千減至七千人。

很顯然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破壞工作，沒有逃過工人的眼目。他們開始感到反托洛斯基主義，不僅是X X黨的工作，寧可說是一切工人組織的工作。對於警戒法西斯主義的代理人的托洛斯基派感到興味。

工人大衆不能不看到：他們英勇犧牲的反對人類死敵的法西斯主義的時候，托洛斯基與其

黨徒和法西斯蒂聯盟來反對蘇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工人運動；工人們看到在各國人民大眾反對戰爭努力和和平的時候，托洛斯基及其信徒則與最進攻的法西國家緊密的一致做戰爭的推動者。工人大眾努力團結他們的力量，建立統一戰線來反對共同的階級敵人的時候，托洛斯基派則爲了布爾喬亞的利益反對建立統一戰線，並且努力分散工人，弱化他們，使他們失敗。因此工人對於托洛斯基主義的仇視日益增高，他們對於不能否認的事實更加了解：如果不澈底的反對他們的托洛斯基派的代理人，反對法西主義是不可能的。爲了團結一切反法西斯蒂的力量，反托洛斯基主義的鬥爭，是工人反對法西主義和戰爭的鬥爭的不可分的一部份。

托洛斯基的失敗

三六

托洛斯基的失敗

Louis Fischer 著
基 譯

The Nation (四月十日)

從前托洛斯基認為農業集體化和超工業化的政策是他的。托洛斯基主義的信徒們也說：「史太林趕走了托洛斯基而盜取了他的計劃。」在這本書裏，托洛斯基不啻從自己的口中推翻了這些爭論。

一九二六年托洛斯基的政綱說：「我們必須迅速發展集體農場，以對抗農村中個人農營的滋長。每年必須有計劃地提出一大筆經費來幫助有集體組織的貧農。」自一九二一年後，蘇聯即已有集體農場的組織。托洛斯基主張給它們更多的經濟幫助，以便能繼續與個人農營競爭。但是他對於正在發展的個人農營，却並未主張壓制。他以為用了經濟幫助的方法，「農業的社會主義化……可以在數十年的時間中完成。」要是他主張毀滅農村中的私有資本主義，迅速地完成全國規模的農業社會主義化，那麼，托洛斯基便不成其為托洛斯基了。他並不這樣相

信他的「不斷革命」論。他認為：直到世界革命使他們能實行社會主義的農營前，布爾雪維克僅能在城市裏把握到社會主義領導權。他的反對史太林「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大半是由於他沒有看到蘇維埃農業集體化的可能性。

托洛斯基的政綱也沒有要求立刻毀滅富農。他利用富農，托洛斯基派在一九二六年的政綱中有一點說：「加速工業化，特別要用增加租稅於富農的方法，」富農固然是「一個威脅。但是他們的人數並不怎麼多。而且也不很富有，托洛斯基的增加租稅和強迫借貸的政策，會造成消極的抵抗和拒絕。城市的供給。這種事情在一九二七年確曾發生過，「五年計劃」若用富農這隻鵝的少數金蛋來經營，定會失敗的。史太林則用通貨膨脹政策的方法。這個方法固不很上算，但是除此之外，又有什麼別的方法呢？然而托洛斯基却反對通貨膨脹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他的政綱要求「保證貨幣的絕對穩定」在一九三二年，又主張「用嚴厲手段制止膨脹政策的進行。」停止通貨膨脹不啻停止了工業化，而托洛斯基也確承認「看來似乎『龜步』論（Turtise Tempo）的辯護者和超工業主義者暫時互換了地位。」其實，不是暫時而是永

遠互換了地位。托洛斯基主義者剛在一九三六年爲超工業化辯護，而在一九二七年又立即退去了。

托洛斯基沒落的理由，就在這裏。他以可佩的勇氣在這本書裏談到「史太林爲什麼勝利」這個問題。爲什麼神氣的托洛斯基及於所有偉大的理論會給「平庸」的史太林打倒？托洛斯基的回答是一堆不能令人滿意的混雜話。他說：革命後有一個反動的時期，這是因爲羣衆厭倦了，有軍事訓練的紅軍軍官被遣散了，「勞工階級的卓越代表或死於內戰或高升而脫離了羣衆」，在國外革命的企圖失敗後，蘇聯人民失望了。這種對於革命的再生力量的完全缺乏信仰，正幫助說明爲什麼托洛斯基今日會流浪在墨西哥。革命吞沒了它的子孫，但又產生了更多更好的子孫。蘇聯的歷史天天在證明這個事實，但是托洛斯基却不信任第二代的革命者。他說：「至於這般青年官僚，他們是老前輩所選拔和訓練的，他們大半是那般老前輩自己的子孫（這是托洛斯基許多無證據並且無可證明的侮蔑之一）。這些人決無完成『十月革命』的能力，但是他們頗能坐享其成。」這些話的偏頗是很顯然的。加干洛維支，柴洛夫，波特雪夫，伯黑

阿，墨斯洛克以及今日蘇聯其他許多領袖，他們現在大多是四十歲左右的人，在一九一七年的時代，年紀還都很輕，自不能佔到卓越的地位。

托洛斯基提到了所有他認為使他的集團在一九二八年被壓倒的因素；但是他忘掉了一個因素。在一九二七年「十月革命」紀念日，托洛斯基企圖在紅軍和市民的行列通過紅場時，親自在莫斯科街道上表演一個反史太林的示威。這個企圖如果成功，結果便是一個托洛斯基的政變。然而這是不能得到支持。孤注一擲，他是失敗了，因為托洛斯基主義在蘇聯是必然失敗的，這是由於它的領袖不能有所作為。托洛斯基的政策是高唱「世界革命」；然而在一九二四年後，由於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結果，世界革命正落回低潮。同時，托洛斯基又不主張用超工業化和集體農場的方法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一個消極政策，是會使國家的生氣麻痺，造成一種極惡劣的反動的。雖然世界革命的運動是低落了，但史太林却知道如何去激起一種為國內建設的新的革命狂熱，這是史太林最偉大的貢獻。這個貢獻使農村與城市中的巨大建設得以成就。

對於這種進步，托洛斯基僅在全書的短短的第一章裏敷衍了幾句稱揚的話；其餘部份完全集中在充滿着冷諷的指摘和對蘇聯政體的仇恨。長年的窘迫，當然不可避免地造成這種冷酷和仇恨，但是這並不是成功一本論述蘇聯狀況有價值的著作的條件。這本書充滿着變曲的配景和無盡數的論斷。這些論斷的優美的文體和強調的語勢並不能代替證據；實在它是沒有證據的。一個作家，若能以公正的態度，信任革新之物質的和精神的潛存在，是可以以一章書來論蘇聯的所有的嚴重缺點，而以其餘部份來敘述其偉大的勝利的。假使，因為韋伯夫婦（Webb）和英國的大律師及國會議員布里特（Pitt）稱頌蘇聯，而托洛斯基竟然說前者是在「蘇聯官僚」的指示下寫他那一本論述蘇聯的大著，後者是出於莫斯科的僱用，那麼，托洛斯基似乎連那種估計蘇聯進步的不可缺少的賢明態度都沒有了。

一般說來，這本書是沒有考慮到讀者對於蘇聯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知識的。因此書中許多的理論部份使托洛斯基受到歪曲馬克斯主義的指摘。托洛斯基引證了「真理報」的一段話：「在第二屆五年計劃中，資本主義成分的最後殘餘，即將在我國經濟中被清算。」於是他便

批評道：「根據這個展望的觀點看來，國家亦應在同時期徹底消滅；因為資本主義的『最後殘餘』被清算了後，國家便無用處了。」

托洛斯基主義者的這種立場，是乖離了共產教義和普通常識。列寧論述社會主義——列寧和馬克斯稱某為共產主義的初期或低級階段——的特徵說：「在不復有資本家，不復有階級，因而不復有可壓迫的『階級』時，國家就漸漸地消逝了。可是那時國家還未完全消逝，因為維護『正不平等的『布爾喬亞權利』的保障仍還存在着。要完全消除國家，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而在托洛斯基看來，資本主義沒有了國家即不復存在。但是列寧以及馬克斯却認為國家仍會存在。這於托洛斯基的哲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倡言，蘇聯的國家既未消逝，蘇聯便沒有社會主義。他認為國家是應在社會主義下消逝的。復次，他看到蘇聯仍有不平等的存在，覺得異常驚駭。反之，馬克斯，恩格斯和列寧則早已看到不平等是最初階段的共產主義的特徵。小布爾喬亞的知識份子們（近年來托洛斯基對他們盡其搖尾乞憐之態）顯然以為資本主義的破

滅，會立刻終止所有的不公正和不平等。但是馬克斯曾指出：社會主義，在其初期，「在經濟的，道德的，和知識的各方面，必然點染着它所從出的那個舊社會的遺傳的病症。」只有一個幻夢者或盲目的評論者，才會去希望蘇聯已是一個十全的社會，托洛斯基所謂「社會主義的平等」這一名辭，其本身就是矛盾的。

沒有一個人知道規律社會主義制度出現的法則。從來也沒有人知道。怎樣和在什麼時候國家會消逝。馬克斯和列寧都未加預言。社會主義國家要安全地消逝，它首先須非常強固，足以壓倒所有內部的敵人，非常安穩，足以防衛外來的侵襲，這是合乎邏輯的。因此，「消逝」不是在革命爆發時即開始的一種過程。首先有一個國家權力的高峯，然後這個權力才漸漸低下。在蘇聯由於農業資本主義的破滅，這個「低下」的過程已極其自然地開始。這在對國家政治管理局（G. P. U. 音譯為格伯烏）的嚴格限制，和在頒佈的新憲法中，國家機構及共產黨讓出部份特權上，已可說明。托洛斯基對於這些劃時代的改革是完全忽視了。要使他相信官吏政治可以自動消除，當然是不易的。然而蘇聯最近所以採用祕密的不記名投票制，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托

托洛斯基在書中也提到史太林的這段話，他甚至不企圖去批評史太林。實際上，他是部分地接受了史太林的話。但若完全地接受了，便宣告了他所謂官僚政治的權力無限和時期無盡的全部理論的破產。

不平等的演化，和國家的消逝一樣，是未曾預示過的。托洛斯基自己也說：「在計劃的制度裏，不顧及生產者與消費者個人的直接利益，即他們的自利主義社會建設的成功是不能想像的。」這句話是對的。這正是蘇聯的不平等的根基。至於今年的不平等比了上年是多是少，那是由環境決定的。托洛斯基說：「真正的平等一天不能保證。」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存在一天，「便有一種產生和支持少數特權者的必然性。」但是問題是：是否隨着不斷滋長的繁榮，這個少數，仍就不能成爲多數。只要肯做一個斯泰哈諾夫運動者，或參加其他的活動——在蘇聯這種機會是無限的——任何人都能立刻成爲「特權者」的一份子。然而在貴族政治下，特權階級的人數都是有限制的。

甚至托洛斯基也承認：「我們並不懷疑，在蘇聯，生產品的分配，比之帝俄時代，甚至比之西

方最民主的國家，也是不可比擬的更民主化。」——這正使托洛斯基的「朋友和信徒」依斯曼（Max Eastman）爲之狼狽；如其他會狼狽的話。隨着蘇聯的生產力和技術的向上，在技術家、官吏和工人的實際收入間的差別是減少了。斯泰哈諾夫運動使它向這個方向發展。托洛斯基在一章裏斷言着：在蘇維埃的勞動生產力未超過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力之前，不能有完全的社會主義。這完全對，社會主義的發展若是趕不上資本主義的水準，便是一個畸形的東西。但是蘇聯是作爲一個極落後的國家開始的，而其進步神速，已達到近代技術的高度，距離帝俄時代的水準已不知有多遠。經過了這許多年，用計劃經濟消除了所有生產落後，經濟恐慌，自由爭競，和商業宣傳的浪費，勞動在蘇聯的生產力和一般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已無遜色。復次，最近在西班牙的天空中已證明了蘇聯的技術或者不僅超過了德國和意大利，而且還超過法國和美國。這是一個例，其他還有許多，將來還更多。蘇聯的前途是無限的。

要知一個人對於未來事情的判斷，可看他對現在的態度。托洛斯基對於蘇聯的前途，除非它的政體被傾覆了，總是悲觀的。而蘇聯的朋友們，——托洛斯基是那樣給以無效的咀咒——

却是樂觀的。而且，蘇聯大眾對西班牙人民的熱切擁護和蘇聯人民在西班牙的作爲，更加強了對布爾雪維克革命的健全、強大和建設的性質的深切信仰。托洛斯基意氣揚揚地所診斷和誇大的那些病症，是將消除的，和其他已經消除了的一樣。

答復托派對救亡陣線的詆蔑

亨利

救亡陣線的「主要任務是促成各黨各派澈底團結共同抗日，」但是救亡陣線自身「決不願幫助任何黨派去攻擊任何黨派，」這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成立之初，就鄭重聲明過的（見成立大會宣言和初步政治綱領。）但是如今國內竟有一個政黨（而且自稱是「革命的」）以攻擊和污蔑救亡陣線做了它的主張的政治工作，所以站在救亡陣線上的人，對於這樣的政黨的政治主張却有加以駁斥的必要。這個所謂革命的政黨就是托洛斯基派。

如今中國的托洛斯基派的組織上和思想上的同志們領着人家的津貼主辦的以攻擊救國會為宗旨的「免審」刊物很多。他們所用武器雖然都是從托洛斯基的理論武庫中取來的，但是他們為取得分工合作的效果起見，往往在對於救亡陣線的理論及其組織加以惡毒無賴的侮辱和漫罵之後，更裝腔作勢的聲明他們不是托洛斯基派，甚至於對自己的托洛斯基同志也附帶地罵了一場（為了表明自己「並無背景」起見，）說後者是強盜匪徒等。所以我們的

噫！如果以這些刊物的言論爲根據，托洛斯基派必然而起來否認，所以在本中文完全以「老牌」托洛斯基派的言論爲根據。

在中國托洛斯基派的機關刊物「鬥爭」二卷二期上，發表有托派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布爾塞維克列寧派政治決議案」，這決議案是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過的。我們如果把這個決議案的言論來代表托派主張，想來就是老牌的正統的托洛斯基主義者也不至於起來否認吧。

托派主張同時要反對一切的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和富農中農。他們認爲能夠革命的祇有工人和貧農，其餘的社會階級都已經成了革命的對象。表面上看來，托派好像成了現代的吉珂德先生，連看到了風車和羊羣都要大喝一聲，向前衝鋒似的。但是，實際上，他們沒有吉珂德先生那麼傻。他們頗知道集中火力攻打自己最痛恨的目標。在他們的心目中，這樣的目標便是所謂「史太林黨」（共產黨）和救國會，因爲這「乃是中國革命運動中最大的障礙」，所以在他們的決議案中以及「鬥爭」的其它論文中，無不以這個爲主要的攻擊目標。

托派和共產黨的論爭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內；所謂「怨有頭，債有主」讓牠們自己算吧。在這裏，我們來檢討一下托派對救國會以及整個救亡陣線的政治主張的攻擊。

托派認為救國會是叛變了民族，因為救國會主張集中火力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儘力維持英、美、法等國在中華民族的抗日鬥爭中的中立態度，甚至主張同他們作某種攜手。托派認為救國會的這種主張是「無恥的宣傳」（見鬥爭二卷二期抗日勿忘抗英一文）可以引起羣衆對英、法等帝國主義者的幻想。托派對救國會的這種攻擊是不是有根據的呢？我們認為這是沒有根據的，這僅是一種攻擊而已，而且是一種惡意的攻擊。

這裏不用強辯我們可以引去年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上通過的「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中的一段話爲證。這文件中有一段說：在「反日第一」的原則之下，我們對國際的關係應該是如何的建立呢？自然，我們應該儘量的少樹敵人，歐美列強在本質上固然是帝國主義，但是在現階段的國際形勢之下，牠們還不可能直接以大量武力干涉中國革命；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意孤行，堅持獨佔中國，尤其使得牠們感到不滿與危懼。因此，中國在外交上如能

善爲運用，牠們是可能給與我們以相當援助的，至少我們可能維持牠們一個中立。不過，我們也不能對牠們存着過大的希望，否則就可能遭遇着意外的打擊，而取得可恥的失敗。」

救國會對於帝國主義列強的態度，在上面這一段文字中，說得再明白也沒有了。這裏，根據現實環境的分析，指出中國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所可能得到的同情和援助，同時又警告全國人民勿過分樂觀，對帝國主義勿作過分的奢望，以致陷入可恥的失敗。祇有存心挑撥，不顧事實說話的人才會認爲這是造成人民對帝國主義幻想的主張。

一年來的國際情勢的演變，非但沒有理由要我們放棄初步政治綱領上的這項估計而且，有十分理由要我們強調這一點。日德同盟和德意軸心之成立，把國際上的和平陣線和侵略陣線劃分得愈加顯明，凡是在目前不願意戰爭爆發的國家（不論出自何種動機，不問其堅決程度如何，時間久暫與否）都有可能對於我們的抗日戰爭維持一個中立，一旦世界大戰爆發，在日德意等法西國家以外的列強，頗有同我們取得聯絡的可能。在此種情勢之下，我們有什麼理由一定要把這些中立的甚至可能取得聯絡的國家趕到敵人的懷抱裏去呢？聰明的軍事家不

是要多樹立敵人才算表示他的英雄；反之，是要儘可能的孤立敵人，多結同盟者（至少是友誼的中立者），以集中的火力擊碎當前的主要的敵人，因此不禁使我們對於托派在目前不願強調反日，而要高叫『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見上述決議案）的行動示表了懷疑（請大家注意！這是在全國各階級民衆的注意力剛是開始集中到反日這一目標上來的時候。）大家或許還記得不久前莫斯科托派審判案中，拉狄克曾經供認托派爲要取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以推翻蘇聯現政府起見，曾經答應不在中國作妨礙日本侵略中國的行動；我們如果把這供詞同中國托洛斯基派的言論行動聯起來看，纔覺得上面我們的懷疑是有很大理由的。

第二，托派說救國會是背叛了工人階級。在這裏，我們首先要聲明，在救亡陣線方面本來就沒有自稱是代表什麼階級的利益，救國會曾屢次聲明自己的任務是團結各黨各派各階級的人士從事抗日鬥爭。所以本來就說不上什麼『叛。』我們所應說明的是：救國會號召工人階級同社會上其他各階級共同攜手從事救亡運動是否違背了工人階級的利益。每個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給這問題以否定的答覆！試問國家亡了，民族失去了獨立，工人階級還能得到解放嗎？

當然不能的。相反的，那時候，工人階級在兇惡的帝國主義直接統治之下，壓迫更重，鬥爭的環境更困難（台灣朝鮮即是實例，）也就是說將更不容易得解放了。所以抗敵救亡也應該是目前中國工人階級的唯一最主要的任務。

托派認為中國『真能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只有工農兵士以及下層小資產階級等勞苦大眾。』中國的地主（不論大小）在他們看來當然是不會反抗帝國主義的，甚至就是『中國的資產階級，由於其政治的與經濟的地位使然，也根本不能反對帝國主義，尤其不能反抗最急進的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托派認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不僅要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任務一視同仁地看待，而且『要抗日鬥爭得到勝利，必須打倒資產階級國民黨以及各地軍閥的政權，換句話說：完成中國革命中的民族任務，同時必須完成牠的民主任務。』（見上述決議案。）（不用說明，當然更要反對史太林黨和救國會。）

大家知道，托派早已就把中國社會認做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他們在十年來的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所採取的一貫態度。所以他們認為中國的革命早就走入了社會主義革命的

階段，中國的資產階級遠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就反革命了，不足以成爲革命大眾的同盟者。我們在這裏，覺得奇怪的是：托派既然要喊『打倒資產階級國民黨』，何以又說這是民主的任務呢？難道天下有以打倒資產階級爲其內容的民主的（即資產階級的）任務嗎？

我們承認中國的革命，有一個反對帝國主義民族解放的任務和反對封建殘餘勢力的民主主義任務。而且反對封建殘餘勢力的民主運動中，代表封建勢力的地主固然是反對這運動的，就是資產階級，自從一九二七年以後，也已經不會來贊助這一運動了，（但是反對資產階級不是這運動的內容）因此，使他們對於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大大地失去了勇氣。然而，自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進一步侵略，把『抗日第一』成了各階級一致公認的原則，把國內各種社會矛盾的澈底解決暫時放到了第二項議事日程中去以後，國內各階級在抗日鬥爭中的合作問題，又重新有了提出的可能。

當然，我們也承認在抗日戰線上，國內各階級的決心和勇氣是不相同的。以日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爲寄生體的買辦階級對中國的抗日戰爭的發動當然是不願意的（這裏英美的買

辦態度又有不同。最富有保守性和寄生性的地主、金融家和投機商人對於抗日的決心也最極微弱的。我們如果要找尋漢奸在中國社會機構中的根源的話，那麼主要的就應該到上述這幾種社會等層中去找。然而就是對這些社會等層也不能一視同仁地看待。買辦有日本買辦和歐美買辦之別，地主也有大中小之別；當日帝國主義要兼併（或以廉價強買）地主的田產的時候，地主對抗日戰爭至少有保持一個中立的可能。並且有許多中上地主是兼營工商事業的，有許多中小地主是要靠官吏職員、自由職業者、教師等薪金收入來維持生活的。他們在這一方面利害關係往往可以推動他們在抗日戰線中採取較堅強的態度。至於民族工業資本家，則因在日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武裝走私的壓迫下，時時感受到崩潰的威脅，他們的態度當然比地主可以更堅決些。救亡聯合陣線的任務就是在於不要把這些不徹底的、微弱的、或暫時的抗日力量摒棄在外，而應把他們集中起來，推動他們，扶助他們。善戰的將軍們，不僅重視整師整旅的友軍，也同樣重視一連一排的小隊伍，甚致對於他們的友誼的中立也很重視。這就是救國會至於抗日決心不十分大的社會等層所採取的態度。我們相信維持一個地主在抗戰時期

的中立，不使他投入敵人懷抱中去充當漢奸，其意義同吸收一個積極的戰士到自己的隊伍中來是同等重要的。

當然，我們承認工農大眾是未來的抗日戰爭中的主力軍，這不僅因為工農大眾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了他們的最堅決的抗日的態度，而且他們是中華民族的最大多數的人口。我們也屢次主張：爲了發揚大多數人民的抗日力量，必需在政治上給他們以最大的民主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在經濟上，要相當改善他們的生活。我們對於工農大眾的合理的改善生活的鬥爭，就是站在民族抗日的立場上也是該給與同情的。但是爲集中力量對付強敵起見，我們希望工農大眾對於資本家地主，在目前這階段上勿提出過高的要求，希望工人的政黨團體勿從事推翻國民黨現政府的企圖。我們相信覺悟的工農份子對於這種主張是會同意的，但是托派却因而把出賣工農利益的罪名加諸救國會了。托派現在主張工人應該起來打倒資產階級，農民應該起來實行土地革命。

其實托派是一向輕視那個構成民主主義革命主要內容的土地革命的，在托洛斯基派的

政治決議案中，土地革命也是當作社會主義革命而提出來的。所以在這決議案中，他們提出了『土地歸貧農』的口號！這就是說，鄉村中的貧農不僅要反對地主和富農，而且連中農都在打倒之列了！

總而言之，托派主張工人貧農應該聯合起來在對外方面，同日英美法等一切帝國主義作戰，在對內方面，同時推翻地主資本家富農中農。這氣魄是浩大的：他要工人和貧農像趙子龍在長板坡一樣單槍匹馬地同一切人作戰，然而其結果，恐怕不僅是斷送了民族的前途，而且斷送了工人階級自身的前途。

托派如此『勇敢善戰』，想來他們自己對於這『單槍匹馬』的戰爭是很自信有勝利的把握的吧！其實，一點也沒有這麼一回事。

托洛斯基本人對於經濟落後的俄國革命就否認有單獨勝利的可能，對於殖民地民族革命更認為『在現今世界關係及集團力量配合的條件下，無論那一個殖民地，無論那一個被壓迫民族，不依靠某一帝國主義列強，不作帝國主義手裏的工具，便不能進行其解放的戰爭落後

民族的戰爭再不能有任何獨立的意義了。』

有人或者不信托洛斯基會講這句話吧！或者以為在如今他（尤其是他的中國的同志們）總不會再說這樣的話了吧！可是，沒有這回事。在上述議決案中，仍以不同的形式重複這意見。他們說：『惟當我們考慮到革命勝利的因素時，決不能僅以國內的階級關係為己足，國際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的消長於中國革命（以及一般殖民地與半殖民的解放運動）的成敗具有最後決定的意義。』說得最明顯沒有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尤其是日本無產階級革命未爆發之前，即是最後決定勝利的因素未具備的時候，中國人民還是等待着吧！所以，實際上，托洛斯基主義就是在高談世界無產革命的掩護下，取消中國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取消主義。

聽到莫斯科的電報說托洛斯基勾結德日推翻蘇聯現政府，出賣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好像使人總有些難於置信。但是任何人讀了中國托派的政治決議案以後，對於這消息定可以全部相信了；救國會和救亡聯合陣線既然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障礙，那麼要談中國革命就要從革

救國會的命，革救亡陣線的命做起了。至於反日鬥爭，那是在最後的決定勝利的條件未具備之前，還是同「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革命」等等當作了高調唱唱就夠了。這同「不要妨礙日本在華侵略行爲」的密約當然是符合的。

同樣的，托派說：人家說他們出賣蘇聯是冤枉的，他們是熱烈擁護蘇聯的，但是他們認爲蘇聯現存的「史太林官僚制度」是出賣蘇聯工人階級的叛逆，世界革命的障礙，因比要挽救蘇聯工人階級的勝利，要掀起世界革命應該從推翻蘇聯現行制度着手起。在這世界革命的「高超的」名義下，勾結德日（這是手段呀！）犧牲區區中國的民族獨立更算不得一回事。

中國托派在上述決議中號召他們的同志「參加一切羣衆的救國組織，勇敢擔任各種抗日（!!）工作，以便取得組織中優秀份子的信仰，而領導他們走上正確的（?!）革命道路，但同時我們必需無情地批評各該組織之愛國主義立場」……並且「竭力打擊史太林黨（!?）毒害工人運動的愛國主義。」

多餘的解釋是不必了；但是希望救國陣線中每個戰士謹防這些「高超的」「英雄」們的「領導……批評……打擊……」等好意。

揭破托陳派降日攻蘇陰謀

章乃器

假若你們的言論不是御用的，不是獨裁的，不是壟斷的，不是片面的，那末，這一封信你們就應該一字不改的替我登出來。不然呢，你們便是無恥。便是躲避；將來的歷史會裁判你們的。

在太平洋會議的輪廓畫一篇社論裏，（八月二十五日）你們那位作者指出日本代表「主張簽訂所謂遠東區域公約，成立新和平組織，意在以和平為幌子，來掩蓋其獨佔中國的面目！」這並不是那位作者新發現的奇蹟，我們在近年間已經不斷的指出。

然而，他在引用這些舊話之後，畢竟要抬出來他這一套「奇蹟。」他接着就是「在蘇俄方面，為求與日本謀妥洽，曾竭力鼓吹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緩和日本對俄的情感，並採取太平洋集體安全的口號，來求蘇俄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自保。」他痛罵蘇聯不夠，還要侮辱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

因為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是救國陣線的一個政治主張，我不能不給他一個答覆。

我們反對犧牲民族利益向任何國家親善；我們尤其反對犧牲民族利益對任何國家攻擊。民族的利益，是不容許少數人作爲恩怨的酬報的。

我們主張親善蘇聯，爲的是保全民族的利益。中國的出路只有兩條，一條是投入國際侵略陣線，在遠東和日本攜手，以進攻蘇聯的路線。——這是漢奸的路線。又一條是加入國際和平陣線，聯合太平洋沿岸能以平等待我的國家，締結太平洋集體安全公約，尤其要和蘇聯聯合，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路線。——這是救國的路線。像中國這樣一個國家，能夠企圖右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左手打倒蘇聯嗎？那真太不量力了。像法國都還要聯合別國以對付德國呢！

中國非聯蘇抗日，便只有投日攻蘇，這是誰都知道的事情。親日的漢奸們，也明知道這個形勢。然而，在民衆反日情緒的壓迫之下，他們不敢公然提出「投日」，因而先在「攻蘇」二字做工夫。他們除了在積極方面進行通過親德以親日的政策外，在消極方面，還要用種種武斷宣傳的手段，一口咬定蘇聯是中國最大的敵人，以期轉移人民的目光，無形中消滅抗日。所以，像你們那位作者這一套論調，即使不是有意做漢奸，至少是無意中被漢奸利用。

如果你們那位作者有一點國際常識，他就應該知道：集體安全制度是反侵略的，是不可能存在着一絲一毫的侵略意義的。他也應該知道：集體安全制度是在整個的不可分割的和平意義之下進行的，牠不是遠交近攻，也不是聯甲攻乙，而是對各方面同時同樣的反對侵略，保障和平。他還應該知道：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雖然是採取戰爭的方式，然而動機是在反抗侵略，在爭取和平；牠不但不違反集體安全的意義，而恰恰相反，集體安全制度正是要加強這種反抗侵略的力量——是用許多國家的力量，共同反抗侵略。

日本帝國主義所號召的區域公約和所謂遠東和平新組織是什麼東西呢？牠是企圖以東亞主人翁的資格，實現中日「滿」聯盟，不但要把東北永遠據為己有，淪為戰場，而且要把整個中國拖到侵略陣線裏去，做一個悲慘可惜的犧牲品！這種併吞中國以進攻蘇聯為目的的區域公約，能和集體安全制度混為一談嗎？那麼，你們那位作者恐怕是不單無識，而且簡直是無恥了！

過去幾個月的事實所告訴我們的，是蘇蒙協定成立之後，日偽軍已不敢再進攻外蒙。假如太平洋集體安全公約真能訂立下來，牠的主要作用究竟在保障有強大武裝力量的蘇聯，而如

你們那位作者之所謂「求蘇聯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自保」呢，還是在保障一個武裝力量落後的中國，或者是雙方各受其利，各蒙其益？民族危極急迫如此，這些問題，還不應該密切注意嗎？

據我所知道，在你們的集團裏，存着托洛斯基的信徒。托洛斯基派的活動，在這次蘇聯反革命陰謀的審判當中，已經暴露出來：他們在歐洲方面，已經不惜聯德以攻蘇。在遠東方面要聯日以攻蘇，也許是應有的文章吧？所以，他們和中國親日派官僚合作，是十分可能的，即使不是有意識的合作，然而在鼓吹「蘇聯是中國最大的敵人」一點上，至少是無意識的互相呼應。

托洛斯基的政治生命，已經被判末日了。托洛斯基的信徒……（他們）不擇手段而至於結勾日德以圖傾覆蘇聯，那種「蘇奸」的活動，是在任何的主義之下，在任何階段的歷史當中，都是不會有地位的。尤其在中國的托派，他們倘使想把中國拖到侵略陣線裏面去，演出「投日攻蘇」的醜劇，把民族葬送到萬劫不復的深墟裏去，那更是罪不容誅！我重複的提出：他們儘管反對蘇聯，然而不能犧牲了中國的前途！

在大美晚報記者當中的這一員托派健將，他在「自覺的懺悔」之後，利用報館的地盤，曾經不斷的運用他的一貫的理論戰術：在類似真理的幌子之下，拿出來他的醜惡言論。那就是說：他在上文說一些好聽的花言巧語，下文拖出來他的最不堪的心理論。這種戰術，不但可以蒙蔽許多政治認識幼稚的大眾，而同時可以使你們一不經心，墮其奸計。我現在揭發他的陰謀，是希望你們爲大美晚報的歷史計，爲你們自己的光榮計，先自動起來糾正了這次的謬論；以後還希望你們不斷提防，當心扒手。自然，如果人類還有正義，社會還有公道，中國士大夫們還有一些廉恥，這種文妖是應該驅逐於言論界之外的。

給托派的公開信

魯迅

陳先生：

先生來信及惠寄的鬥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史太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澤東先生的「各派聯合一致抗日」的主張爲出賣革命。

這很使我「糊塗」起來，因爲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飄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麼？現在的流浪，當與革命前西比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爲那時怕連送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却因爲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其次，你們的「理論」確比「澤東先生們的高超得多，豈但高超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爲日本侵略者

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淨潔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爲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爲你們捏一把汗，在大家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要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麼？這決不是因爲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着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爲我不相信你們會下流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你們決不會的。我只要敬告你們一聲，你們的高超的理論，將不受中國大衆所歡迎，你們的所爲，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我要對你們講的話，就僅僅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爲我的某幾位「戰友」會指我是什麼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然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吧。那一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爲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爲同志是自以爲光榮的。要請你們原諒，因爲三日之期已過，你未必會再到那裏去取。這信就公開作答了。卽頌大安。

評托氏近著「革命的背叛」

P. S. Buck
觀璧譯

Asia 五月號

托洛斯基的近著「革命的背叛」是一本重要的書；若僅因其作者是一個被自己同胞所擯棄的憤怒的失意的人，就忽視它的重要性，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然而這本書的重要倒並不是由於它的作者的地位，或甚至它所揭露的事實。姑不說所謂事實大半是由人製造的，因而剔除和挑選可以完全變更結論，即就托洛斯基所揭露的關於蘇聯的主要事實而言，亦都為對於蘇聯無成見的觀察者所早已熟知，並無新奇之處，所以托洛斯基這本書的重要，並不因為它的觀點，也不因為它的事實的新穎，而因為它是一部關於全部革命理論的有價值的文獻。

從來沒有一次革命，能像俄國那樣徹底。在旁的國家中，總有各種勢力，不斷地來阻礙革命的進展，但是在俄國，卻沒有這種障礙？這個國家，真被掃除得像沙漠般的清徹。反抗勢力已被所謂「清算」的大批殺戮所鎮服。在被認為偉大社會建設開端時所必需的死亡與破壞下，革命

評托氏近著「革命的背叛」

家開始了他們的真實工作。但是這革命的結果，由一個有成見的革命家，在本書中所描繪出來，是完全失敗的。他以為俄國革命，除了解放了少數的官僚份子外，並沒有解放其他的人們；而一種官僚政治，在人性立場上，是與另一種的並沒有什麼區別，不管牠的統治者是專制君主，或者是史太林。自然，根據他這本書上的結論，托洛斯基是要異常憤懣的，他的理論的前提，即從本書的題名便可表示出來了。他認為現在蘇聯的統治，是沒有遵守革命的真正原理。他絕對相信，只有革命的本來力量，才能補救這個情形。僅有的希望，照他看來，就是必須重來一次革命，一次真正的革命，以革命去停止革命。但是不幸得很，他的這種革命的信仰，並不能感動不信他的主義的讀者。俄國革命所發生的，並沒有與以前革命所發生的不同。當大的震動過去，日常生活趨向安定的時候，人類舊有的天性，又重復出現，如愛好私產，因自私而不利用個人的能力去盡量服務，專門去尋找個人的需要，最重要的，還有成爲疏忽與缺乏效能的根源的懶惰習性。從來沒有一次革命接觸過人性，它是永遠不會接觸人性的。人類經過數百萬年的時期，才能從泥潭中拔救出來，但離光明之路還是很遠的，這並不是說革命全無用處。反之，我們對於革命有很大的期

望，革命用來建設一個新的國家，其價值等於炸藥用來準備建築一座新房屋一樣。燃點炸藥的人，絕不是後來建築的人。炸藥可以用來炸毀堅硬的岩石，遺留一個空穴讓他人來奠基，此外便沒有其他的用途。炸藥之用固然可以節省許多勞力，但是由於過度的破壞，在建設以前，還要做彌補的工作，這樣還要化費更多的勞力。我們常拿炸藥來比喻革命，革命為一個盲目的工具。完全要看使用者的手法如何。假若托洛斯基派進行革命而獲得勝利的話，最初的雷厲風行，一定是異常驚人的。但是後來人民仍會充滿着舊有的天性。托洛斯基正像所有固執一種信仰的人一樣，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樂觀者。雖然人們因此而對此書打一樞折扣，而他確實寫了一部有力親切，熱情的書，——牠充滿着實情，即使不是真理的話！

蘇聯檢查官的托案公訴書

爲皮達可夫·尤·爾，拉迪克·克·布，索可里尼科夫·格·亞，舍列布里可夫·爾·波，摩拉希夫·恩·依，利夫什茨·亞·阿，德勞勃尼斯·亞·恩，波古斯拉夫斯基·姆·斯克尼亞節夫·依·阿，拉達依查克·斯·阿，諾爾金·布·沃，謝斯江夫·阿·阿，司托洛依洛夫·姆·斯，杜洛克·依·德，格拉舍·依·依，普森·格·葉，阿爾勞里德·烏·烏，背叛祖國，做偵探，實行軍事破壞，危害工作及準備恐怖暗殺行爲，即犯蘇俄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甲項，第五十八條第八款，第五十八條第九款以及第五十八條第十一款之罪，而提起之公訴書：

偵查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派的暗殺聯合總部（該總部底參加者，曾於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廳予以判決）時，曾經確定：除該總部外，同時還存在了所謂後備的總部，這個所謂後備總部，是依照托洛斯基的直接指令，恐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派聯盟底罪惡行爲被蘇維埃政權機關所破獲而組織起來的。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派聯

轟炸礦井，搶劫銀行，焚燒工廠，而且認爲犧牲人命愈多愈好！於是他們的組織就包括了一切最污穢醜惡的東西，偵探，流氓，賊匪，棍徒，投機者，殺人兇手等無所不有，托洛斯基，皮達可夫，拉迪克等就是這股污穢醜惡的匪黨頭子！這樣陰毒險狠，卑鄙醜惡，真是全世界歷史上找不到類似這樣匪黨的例子。在人類的語言中找不到可以概括這樣一切罪惡的形容詞！

以前也許有人會覺得中國托洛斯基派背叛民族利益，甘作日寇走狗等等，或許是『過甚其詞，危言聳聽』，或許是『個別托派份子的墮落』，現在可以完全明白了，這種托派罪惡行爲，不僅是可信的事實，而且是必然事實，而且必然是根據托洛斯基的直接指令所進行的事實。請看托洛斯基反動的無恥的主張罷。拉迪克在公審法庭上供說，托洛斯基在致他的指示信中這樣寫着：

『如果以爲不取得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良好關係，尤其是最有侵略企圖的，如目前的德國和日本這一類政府的良好關係，就能夠取得政權，這是一種癡想。現在就應與這些政府發生聯繫，彼此商協，是完全必要的。』

拉迪克又繼續說：托洛斯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通知他和德國法西斯訂立的協定的一封信上，有更詳細的寫着：

『要取得與德國和日本的妥協……必然要割讓領土……必須把沿海州黑龍江一帶讓給日本，把烏克蘭給德國……』

我們應當把庫頁島的石油出讓於日本，並保證他與美國戰爭時，供給他以石油。我們也應當允許他來開發金礦。我們應當同意德國的要求，不去阻礙他佔領多瑙河流域的國家和巴爾幹半島，同時不去阻礙日本佔中國……」

托洛斯基所謂「不去阻礙德國佔多瑙河流域的國家和巴爾幹半島，」「不去阻礙日本佔中國，」這還是一種外交詞句，實際上就是幫助德國佔多瑙河流域國家和巴爾幹半島，幫助日本佔中國。

這難道還不是明明白白幫助德日法西斯侵略弱小國家，進行世界大戰的「主張」嗎？托洛斯基根據這樣的主張，爲着幫助德國法西斯在西班牙的侵略，會合西班牙的同黨應

當堅決的進行鬥爭，反對正在進行抵禦德意侵略保衛民族的人民戰線政府；而西班牙的托洛斯基派份子也就根據托洛斯基的命令，不惜背叛祖國，實行了一切陰謀搗亂，偵探破壞，恐怖暗殺的方法，以反對人民政府，以援助祖國敵人的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者。托洛斯基及其匪黨既不犧牲西班牙人民以忠實於自己的主人德國法西斯，試問又有何愛於中國人民，而不犧牲中國人民，以忠實於自己的主人——日本帝國主義呢？

托洛斯基及其黨徒根據這樣的主張，爲着幫助日德法西斯，會不惜背叛自己的祖國——蘇聯，允許割讓祖國的領土，實行偵探破壞，暗殺政府領袖，慘殺自己同胞，不惜把自己的祖國——

蘇聯變成日法西斯的殖民地，那麼，這些匪徒又有何愛於中國人民，而不幫助自己的主人

——日本帝國主義來奴役中國人民呢？

托洛斯基致拉迪克的信中明明白白的寫着『不要妨礙日本侵佔中國。』全中國的同胞們！這就是托洛斯基派在中國的行動綱領。

中國的托洛斯基派正是根據着這樣的綱領，所以實行與日寇勾結，甘作日寇走狗，用一切

方法幫助日寇對中國的侵略，所以極力反對和破壞抗日救國戰線，所以用偵探告密的方法暗害一切愛國領袖和青年，所以極力詆毀和破壞實行徹底抗日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所以與日寇偵探機關和賣國無恥的親日派勾結一氣。

因此，托洛斯基派主要份子張金叙等極力破壞北抗日，主張「聯日反蔣」，實行告密而使抗日英雄吉鴻昌烈士遭受犧牲，正是根據他們的「行動綱領」必然進行的罪行。

因此，托洛斯基派主要份子屠維奇等在北方一帶替日寇偵探機關服務，組織假的「救國團體」和假的共產黨組織等以欺誘愛國青年入阱，而施其告密陷害的毒手，正是根據他們的「行動綱領」必然要進行的罪行。

因此，一些托派走卒在抗日紅軍中，用陰謀破壞，放毒謀殺，臨陣脫逃，背面襲擊等方法來企圖打擊抗日紅軍，正是根據他們的「行動綱領」所必然進行的罪行。

因此，再明顯不過的了，托洛斯基派份子，甘作日寇走狗，叛賣祖國，決不是甚麼「托洛斯基派中個別份子的墮落」，更不是甚麼「過甚其詞，危言聳聽」，而是整個托洛斯基派已墮落到

人類中最反動黑暗的營壘，成爲侵略好戰，兇惡殘暴的法西斯的走狗，爲着忠實於日德法西斯主人所必然執行的罪惡行爲！我們真不能不敬佩魯迅先生和章乃器先生等的明察遠見，他們還遠在此次「反蘇聯的托派總部案」審問以前就已指出「他們（指托派份子——著者）和中國親日派官僚合作，是十分可能的」（章乃器）托派的理論「爲日本侵略者所歡迎，」托派的行爲「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魯迅）

托洛斯基派既然甘作日寇走狗，叛賣祖國，所以托洛斯基派決不只是共產黨的敵人，決不只是先進份子，先進階級的敵人。而是一切有民族天良的愛國同胞的敵人，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的敵人，全中國四萬萬人民的敵人。

我們還必須特別提醒各界同胞，現在有許多托派份子，正在軍政商學各界以至救國團體中活動；他們爲了實現他們的「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總「政綱」，常常用盡一切的手腕來達到他們的企圖；對於願意抗日而猶懷疑於抗日救國統一戰線者，則公開挑撥，主張「反共」對於贊成統一戰線者，則提出許多更「左」的口號，如「要以反帝和土地革命爲統一戰線的

基本要求，「打倒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或者故意挑撥羣衆而做出過火有害的行動，或者表面上做出很「忠實」，「努力」於統一戰線，而實際上進行陰謀破壞的工作。據各方消息，在山西陝西廣西香港各地，在上海各救國團體中，在菲律賓的華僑救國團體中（如本報歷次揭發的高承烈等）都有這些聯日賣國，陰謀破壞的托洛斯基派份子的活動。我們要提醒各界同胞，不僅不要相信他們所喊的「高超理論」的口頭禪，而且要知道他們是口蜜腹劍卑鄙醜惡的陰謀家，是叛賣祖國的十足的日寇偵探，是陰毒險狠，無惡不作的匪黨。如果不願意中這些日寇偵探的鬼計，不願意墜入他們的陷阱，便只有「除惡務盡」把這些日寇走狗的托洛斯基份子一律驅逐出去。

托洛斯基派叛國案審判記

于炳然

在世界知識第五卷第三號上，曾刊載我寫的一篇通訊，題目是暗殺團的公開審判，由那篇紀實的文字中，已可窺見托洛斯基等的陰謀。想不到，其倒行逆施，更有甚於此者，待我再一次的樸實寫來，以餉國人。

一 彼一案

在上次暗殺團公審之後，和這次叛國案公審之前，還有一次陰謀案的公審。當時我的手頭本已搜集了一批材料，但因一時的惰性作祟，一天又一天的拖延下去，後來，索性把這些材料餵了字紙簍了。可是，我現在確乎深深的追悔，早知由那一案還能引出更重要的這一案，無論如何我要克服當時的懶病的。無已，再作個簡略的追述吧！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蘇聯最高軍事法庭會在新西比爾斯克城公審，被告人犯諾斯

可夫、樞賓、枯羅夫、羅斯勒柯、安達耶夫、柯發林柯、李歐尼克、泊愛可諾夫、與德國偵探石體柯林等九人。經過三天的公開審問，該犯人等一致供出：在庫茨巴斯工業區內，在克麥羅夫煤礦中托洛斯基派的餘黨，受托洛斯基的直接唆使，經德國偵探石體柯林的共同計畫，組成了暗殺團和破壞團，暗殺的對象是西伯利亞區黨委會書記艾企氏，以及到該區視察的黨國要人。一九三四年秋，莫洛托夫去西伯利亞，當時該暗殺團決定開始行動，委一汽車夫阿諾爾得實行覆車，但因駛車之速度不足，車雖覆，而未達其暗殺之目的。因此，該暗殺團中一部分人犯被捕，但上述九被告，並未受連帶發覺，所以他們仍得進行破壞蘇聯經濟建設的陰謀，這是托洛斯基派的所謂「新路線」，他們要破壞蘇聯的煤鐵工業及化學工業，藉以減削蘇聯的國防力量。

石體柯林是德國法西斯的偵探，但他披着一件高等技師的外衣，混到蘇聯來工作，當他在「北礦」工作時，即曾屢次的實行破壞工作，同時擔任着指揮，麥克羅夫煤礦的托洛斯基派，以破壞為職志。當蘇聯副檢察長審問他時，曾問：「你們的破壞目的何在？」他直言不諱的答稱：「我為着幫助法西斯主義而出此。」又由他的口供中，知道他曾於假期中遊返柏林，向德國暗探

局報告工作，並與某國駐新西比爾斯克的外交官員，呵成一氣。

上述九個犯人，陰謀破壞克麥羅夫煤礦，利用他們工程師技師的地位，在煤礦中製造許多不通空氣的隧道，又故意破壞了礦穴中流通空氣的系統，並在礦穴中埋藏毒氣和炸藥，使工人時有毒死炸死之危險。工人稍一表示需要改變其工作的條件，他們便肆口責罵，結果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兩個礦工中毒而死。至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礦內又發生了大爆炸，礦工死十人，重傷十四人。據罪犯羅斯可夫供稱：『爆炸雖使工人受害，然而對於我們的工作是有利的，我們破壞該礦之目的，一在於破壞蘇聯之經濟，一在於摧殘工人，引起彼等不滿情緒，以至於對蘇聯政府之仇視。』

由於該礦工人的高度警惕性，由於蘇聯內務部緝奸的敏捷性，這批匪徒都落網了，經過三天的公審，犯罪行為已昭然若揭，於是，宣判了上述九犯一律處以極刑——槍決。但該被告等均曾要求赦免，後經蘇聯政府考慮之結果，僅柯發林、柯李歐尼克及石體柯林三人改處十年有期徒刑。

二 此一案

本來在公審季諾維夫加門尼夫等的時候，已經得到相當的證據，判明庇亞塔可夫、拉狄克等有重大犯罪的嫌疑，待上述一案公審時，證據更充實了，更確鑿了，於是，引出這次叛國案之公審。

這次罪案最主要人犯，和前兩案一樣，都是托洛斯基，因此，我想把托洛斯基加以素描，大概不算浪費墨汁吧。托洛斯基根本是個孟雪維克，只有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時期，才被革命的浪潮把他捲到布爾塞維克的營壘中，可是，他始終未放棄他不正確的理論，同時，他是個富有「狹義的英雄思想」者，自己總覺得是不可一世的，叩其實，正如列甯給他的評語：「不能說一切發光的都是黃金。托洛斯基口中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可是，骨子裏却是「空空如也，」正像一個繡花枕頭，「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列甯全集第十九卷）也正如史太林給他的評語：「與其說托洛斯基像是個英雄，毋寧說他像是個戲子，而戲子和英雄是無論如何不能混為一談

的。』(論反對派)至於托洛斯基的所謂理論究竟是些什麼呢？誰都曉得，就是那套「不斷革命論」，更清楚些說，就是他不承認在一個國家內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但這個不正確的觀點，到現在已爲最豐富的事實所戰勝了。可是，以英雄自命的托洛斯基，不願在真理的面前低頭，他不惜採用極端陰謀的手段，破壞蘇聯的建設，以適應他的不能在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預言。

這次的案情是極其複雜的，這裏，只能寫個輪廓而已。

一九三三年，在托洛斯基直接指揮之下，在上次已被破獲的「莫斯科總部」之外，又組成一個所謂「平行總部」，在「論目的不論手段」的遁辭下，以種種陰謀行爲，反對蘇聯政府。在這個「平行總部」內，包括着庇亞塔可夫、拉狄克、索可爾尼科夫和塞列布里可夫。

所謂「平行總部」的基本目標，在以「破壞」「恐怖」「偵探」等等行爲，希圖推翻蘇聯政府，恢復資本主義，並勾結外國的侵略者，以期加速的向蘇聯進攻。據此，托洛斯基在國外，「平行總部」裏的拉狄克、索可爾尼科夫在莫斯科，均曾與德日兩國的政府代表進行談判。當托

托洛斯基和德國的法西斯領袖之一赫斯（Rudolf Hess）談判時，托洛斯基曾承認：在進攻蘇聯的結果，托洛斯基派獲得政權後，那時對德日兩國，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領土方面，予以極大的讓步。把蘇聯的烏克蘭讓與德國，把蘇聯的東海濱省和俄屬阿穆爾區讓給日本。同時在蘇聯廢除國營農場，解散集團農場，取消國家工業化的政策，恢復資本主義的制度。此外，托洛斯基允許給外國侵略者各種幫助，例如：破壞蘇聯的國家企業和交通，偵探蘇聯的軍事秘密，暗殺蘇聯的領袖……。

在蘇聯幾個大城市中，特別是在諾伏西比爾斯克城，托洛斯基派成立了地方的反蘇聯小組，這次公審的被告中有摩拉洛夫，包古斯拉夫斯基，和德洛勃尼斯，就是西伯利亞托派的頭目。前段所述的「彼一案」就是在他們的直接指揮之下造成的。

關於破壞工作，托洛斯基命令他的黨徒，經過庇亞塔可夫，而與在蘇聯的德日兩國奸細，互相策應，破壞蘇聯的生產計畫，破壞蘇聯的麥克羅夫煤礦，破壞蘇聯的化學工業，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他們破壞了鐵路，使一列兵車顛覆，結果，紅軍死傷各二十九人。

以上所述僅是這次公審叛國案的扼要部分，至於事實的詳情，我特在下邊利用被告的口供，再作進一步的印證。

三 在十月大廳中

這次公審，由一月二十三日起到一月三十日止，地點仍在莫斯科職工俱樂部的十月大廳。首席法官，仍是烏里乞，提起公訴人仍是蘇聯最高檢察官維奧斯基，臨時法庭的佈置，以及公審時的規律，完全與去年那次公審一致。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上次並未邀請各國駐莫斯科的外交官旁聽，這次却正式給各國大使下請帖。我國大使蔣廷黻先生，日本大使，美國大使，西班牙大使等，均曾高坐於外賓席上，而各國的新聞記者之欲發新聞電報者，尚可攜帶打字機，以便隨時編成新聞材料。廳中設有臨時電報處，使各國新聞記者，不出戶門，便可把傳消息送到全世界。

被告人

(1) 庇塔可夫 (Prigotov) 生於一九〇年，前任蘇聯政府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副

委員長。

(2) 拉迪克 (Radex) 生於一八八五年，前任蘇聯新聞報的編輯員之一。

(3) 索可里尼科夫 (Solonikov) 生於一八八八年，前任蘇聯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

副委員長。

(4) 塞列布里可夫 (Serebryakov) 生於一八八八年，曾任中東鐵路理事長。

(5) 利夫什茨 (Livshits) 生於一八八八年，前任蘇聯政府鐵路人民委員會副委員

長。

(6) 摩拉洛夫 (Muralov)

(7) 德洛勃尼斯 (Drobnis)

(8) 包古斯拉夫斯基 (Boguslavsky)

(9) 克尼亞節夫 (Knyazev)

(10) 拉達依查克 (Radaichak)

- (11) 諾爾金 (Norkin)
- (12) 謝斯托夫 (Shestov)
- (13) 司託洛依洛夫 (Strilov)
- (14) 杜洛克 (Turok)
- (15) 葛拉石 (Grashe)
- (16) 普森 (Pushin)
- (17) 阿爾諾里德 (Arnold)

上列十七個被告，因背叛祖國，做偵探，實行軍事破壞，危害工作及準備恐怖暗殺行為，違犯蘇俄刑法第五十八條第一款甲項，第五十八條第八款，第五十八條第九款，及第五十八條第十一款之罪。故而提起公訴。

四 從被告的嘴中吐出一幅可恥的圖畫

爲了使讀者對於本案更透徹的認識起見，我想引用被告的供辭，不過，被告的供辭會佔蘇聯各報紙五天過半的篇幅，一一譯述，勢所難能，我只能從大樹上折一枝摘一葉而已。我想這個案件有六點值得特別注意：（A）托洛斯基的活動；（B）圖謀資本主義的復辟；（C）勾結外國侵略者；（D）關於軍事破壞的工作；（E）關於暗殺行爲；（F）與布哈林等右派的關係。現在，就依照上列六點去摘引被告的供辭：

A. 托洛斯基的活動

被告庇亞塔可夫於一九三一年，會因公赴柏林，托洛斯基指使他的兒子塞道夫和庇氏會面，拉攏庇氏回轉到托洛斯基的指揮下。關於這一點，庇氏會供稱：「……斯密爾諾夫將我的電話號碼給了塞道夫，我們從電話商量好了，在動物園附近的 Amzoo 咖啡館會面。我去了，在

個桌子邊看見了塞道夫，我們彼此是認識的，他對我說，他不是以他自己的名義和我談話，而是代表他的父親托洛斯基和我談話，他說：托洛斯基在任何一個瞬間，從未放棄恢復反對史太林領導地位的鬥爭……以後塞道夫向我直接了當的提出一個問題：「托洛斯基問你，庇亞塔可夫，願意加入這個鬥爭否？」我表示同意了……」

在一九三五年，庇氏又會赴柏林，並由柏林飛往挪威去會見托洛斯基。關於這層，庇氏供稱：「……大概是十二月十米左右，巴哈爾在夫趁着沒人在我身邊的時際，向我說，他幾天前已經知道我將到柏林了，並且已經通知了托洛斯基，第二天他介紹給我一個托洛斯基的通訊員。這個人給我一紙字條，字條上寫的：Y·Z·I 給你送去這個字條的人是完全可信的。並在完全二字之下，還重重的加以墨線。由此，我知道，托洛斯基打發的這個人是可靠的。我們約定了第二天早晨在Tampere的飛機場會面，第二天黎明，我到了飛機場的大門，他在那裏等候我，首先他給我一個爲我準備的護照，這個護照是德國的，一切手續都由他辦妥了，我只是簽個字而已。我們乘飛機離開了柏林，途中毫無停留，差不多下午三句鐘，我們在Oslo飛機場降落了。那裏

有部汽車，我們進了汽車便開駛了，約行三十分鐘，我們到了一個鄉村，出汽車走進一個小房子，屋中的傢俱是很講究的，在那裏我看見了托洛斯基，我看見了從一九二八年來我所未見的托洛斯基，而我們的談話也就在那裏開始了。」

被告拉迪克的供辭中，有許多的地方也供出托洛斯基的活動，例如托洛斯基會號召拉迪克從事鬥爭。拉迪克供稱：「……在托洛斯基給我的第一封信最末一段，差不多是這樣說：你必須記住過去的經驗，而要認清，這不是要你回轉到過去的鬥爭，而是已進入了新的範疇。這新的範疇中的新要素是這樣，或者我們和蘇聯同歸於盡，或者我們必須提出去掉領袖的問題。這裏並未用恐怖的字樣，但當我讀到「去掉領袖」的辭句時，托洛斯基的意思對於我是很清楚的了……」

關於托洛斯基寫給拉迪克的第二封信，拉迪克供稱：「……在一九三四年的信中，托洛斯基這樣說：從法西斯在德國獲得了政權，國際間全部的情形在基本上發生變化了，戰爭迫在眉睫了，戰爭不可避免了，而在遠東的情形，更特別的緊張。托洛斯基毫不猶疑的認為蘇聯在戰爭

中必然敗北，這個敗北產生的實際情形，便於托洛斯基——季諾維夫的聯合得到政權……托洛斯基在他的信中又會寫到，他曾與遠東某國及中歐某國建立聯繫，並且他曾公開的告訴了這兩個國家的半官方，托洛斯基——季諾維夫的組織願意和他們合作，而且準備讓給他們相當的權益，不但是經濟方面的，而且是領土方面的權益。他的信中要求我們，在莫斯科利用機會，對於該兩國的代表，承認同意於托洛斯基提議的步驟。」

B. 圖謀資本主義的復辟

這一部分，可說是托洛斯基的「新路線」的「理論」基礎。但這所謂「理論」，真是荒謬到不可思議，無怪乎蘇聯人民認為，們是最主要的敵人了。看吧，這裏 是他們的口供：

拉迪克供稱：「……托洛斯基給我的信中會說：不必談什麼民主共和，工人階級在革命後，已經生活了十八年，他們已有過度的慾望了，而這些人們，將要一部分回到私人工廠中去，另一部分將到與外國資本極端競爭的國家工廠中去，實質上，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將要激劇的惡

劣化。在鄉村中，貧農和中農反對富農的鬥爭，勢必重現，於是，我們想維持我們的政權，強大的力量是必須的。……假如你願意歷史的重複那就重複拿破崙第一的政權……在他的信中，還有一個重要點，就是，假如我們想始終維持我們的政權，就必須使蘇聯和勝利的法西斯國家相等，這個「平等」的意，就是恢復資本主義的別名。」

被告索可爾尼科的供辭更爲具體些，他說：「關於綱領，這個「總部」的領導份子考慮過，一個離脫羣衆而孤立的行動——像我們的行動，當然不能仍舊沿着社會主義的道路走。我們認爲考斯基的超帝國主義的理論，布哈林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都是正確的。我們認爲法西斯是最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法西斯已經俘獲了歐洲而鎮壓着我們，因此，去和法西斯親睦是比較有益的，用推翻社會主義，復辟到資本主義的意見，去和法西斯謀妥協。……這個領綱預定放棄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政策，預定放棄這種政策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在鄉村中，在小經濟的基礎上日益增長，這種鄉村中的資本主義與工業中的資本主義成份結合起來，就會發展而成爲資本主義在蘇聯的復辟。」

C. 勾結外國侵略者

被告庇亞塔可夫的供辭：「……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和托洛斯基面談時，他曾告訴我，他與希特勒的代理人赫斯談判的結果，訂立了一種協約，包括着這些條件：（一）保證對於德國政府一般的良好關係，並保證在最重要的國際性質的問題上，與德國政府實行必要的合作；（二）同意於領土的割讓；（三）准許德國企業主以租借的形式來開發蘇聯各種企業，如鐵礦，錳鐵，石油礦，金礦，木材以及其他等；（四）在蘇聯造成便於德國私人企業活動的條件；（五）在戰爭的時候，在軍事工業中以及前線上，開展積極的軍事破壞工作，而且這種軍事破壞工作，必須依照托洛斯基與德國總參謀部商妥的指示，而實行之。

由這段口供中，我們知道，托洛斯基爲了掠奪政權，不惜勾結外國侵略者，他與德國所訂的協約，簡直是一紙賣國的文書。然而，尚不止此，他還要把我們中國作犧牲品呢！

被告拉迪克的口供：「……在托洛斯基的信上說：我們應當把庫頁島的石油出讓給日本，

並保證它在與美國開戰時，供給他石油。我們也應當准許它來開發金礦。我們應當同意德國的要求，不去阻礙它佔領多腦河流域的國家和巴爾半島，同時不去阻礙日本佔領中國……一九三四年秋，中歐某國的代表K先生問我：「我們領袖知道托洛斯基先生希望與德國合作，我們的領袖願意知道托洛斯基先生的意見應如何理解？保不定這是一個被放逐者當不能入睡時的胡想？」我從清楚他問我的是個什麼問題，我說：蘇聯的實際政治家充分知道蘇聯合作之重要，並且準備對於這種合作，作必要的讓步。那位K先生當然明白了，我所說的實際政治家是指托洛斯基——季諾維夫的組織。」

關於與國外侵略者勾結被告索可爾尼科夫也會供認，他說：「……有一次在我的辦公室中正式談話完結時，某國外交代表及大使館的祕書官準備退出，某外交代表稍稍停留一下，他利用這個機會，就與我交談了幾句話，他問：「你是否知道托洛斯基先生曾向我國政府提出幾個提議呢？」我回答說：「是的，我知道這件事情。」他問道：「你怎樣估計這種提議呢？」我回答說：「我認爲這種提議是十分鄭重的。」他又問道：「這是你個人的意見嗎？」我回答說：「不是的，

這也是我的朋友的意思」……」

D. 關於軍事破壞的工作

被告克尼亞節夫的供辭：「當我在南烏拉爾鐵路局長任內時，我故意使鐵路交通歸於紊亂，並且特別造成了撞車事件，最嚴重的一次，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在蘇米哈車站，我故意使一列兵車和貨車相撞，這次，死了紅軍二十九人，重傷二十九人，撞壞機車一輛，箱車八輛。……日本偵探機關，曾經特別堅決的主張，在大戰爆發時採用毒菌傳染的方法，要用最易傳染的毒菌，放射於兵車以及軍糧處和防護處內。」

被告拉達依查克的供辭：「當我在化學工業中央管理處主任任內時，我們曾在戈爾諾弗喀，涅夫斯克，涅其克烈森斯克各化學企業內，組織過多次破壞，在戈爾諾弗喀一次，我們會炸死工人三名，使全廠停工數天；一次，我們將該廠空氣室部整個炸燬，將室內工人一名，和正在實習的學生一名炸死，在涅夫斯克烈森斯克我們於縱火之後，即故意令工人前往冒險清除，致燒死工

人十七名，傷十五名。』

被告謝斯托夫的供辭：『……一九三三年五月，我們奉了德國間諜的命令，燒了庫茨尼斯克電力站；一九三四年秋，我們又燒了第九號礦井的煤倉，到一九三五年末，我們竟弄出了六十次左右的礦內起火，這中間被害而死的工人當不在少數，並且因為我們偷藏炸藥時收藏不慎，還炸死了不少工人的小孩。……有一次，勃洛科比亞夫斯克的工程師來向我報告，指出礦務建設工程上某些錯誤處，謂似有人故意破壞，我因恨他識破了我的祕密，便一面騙他說：『我自有辦法，不用聲張。』一面便馬上派人把這工程師暗殺了。……』

E. 關於暗殺行爲

被告庇亞塔可夫的口供：『……托洛斯基在這次談話中對我說：『你要明白，如果沒有接連不斷的恐怖暗殺行動，那就推翻不了史太林的政府，而且這種恐怖暗殺行動，應當儘快加以實現。』……』

被告阿爾諾里德的口供：「——且列普應告訴我，「阿爾尙尼吉澤明天到來了，注意！你將執行恐怖工作了，不論任何犧牲。」我接受這個命令。第二天，我開汽車到火車站去，阿爾尙尼吉澤艾企路海莫維赤，坐在我的汽車裏了……我用極高的速率，大概每小時開駛七十一——八十公里。而在一個半公里以內，我看見了障礙物，我立刻明白了。這就是我實行恐怖手段的地點。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將對我發生什麼樣結果……於是，我不禁的減低速率了，而且突然的停止了……」

被告謝斯托夫的口供：「我遵照摩拉洛夫的指示，在一九三四年，曾經積極準備對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與西伯利亞邊委書記埃依赫的暗殺行動……我們準備了使莫洛托夫坐的那輛汽車，中途遇險（那時，莫洛托夫在西伯利亞考察）以便謀害他，這一陰謀的確是進行了，但却沒有成功……」

F. 與布哈林右派的關係

被告拉迪克的供辭：「假如你注意到我和布哈林關於恐怖問題的談話，我可以詳細而具體的告訴你，第一次談話，是一九三四年的六月或七月，在布哈林到新聞報館作事以後，我會問他：「你走上了暗殺的道路了嗎？」他說：「是的。」我又問他：「誰領導這件事情？」他說：「烏格蘭諾夫，還有我自己。」……木拉奇可夫斯有一次會見布哈林，也會問過這一問題，布哈林答覆他說：「等到任命你爲暗殺總司令的時候，那時再把我們的一切情形告訴你。」……」

在法官盤詰之下，被告拉迪克又供出布哈林的罪惡，他說：「我們曾有一次談話，是關於暗殺基洛夫在政治應得的結論。我們認爲這次暗殺，並未獲得我們預期的結果，這並不是中央委員會的一個打擊，這並未引起羣衆對於反對派的同情，相反的，更引起羣衆熱情的圍繞着中央委員會，並且使反對派大批的被捕了，就是這樣，我們告訴我們自己，或者暗殺個人的結果，使我們放棄這種政策，或者更進而實行集團的暗殺。布哈林告訴我，在他們的「總部」裏，許多人認

爲如以暗殺基洛夫之結果，而完全放棄恐怖政策，那是輕浮、懦怯，應當是正相反的，必須進而計畫一個熱加考慮的嚴重的鬥爭，由混戰而達到有計畫的恐怖……」

在與布哈林等右派的關係上，庇亞塔可夫也曾供出一部分，他說：「有一次我遇到索可里尼科夫，他告訴我陶慕斯基完全應許了加入我們的「聯盟」。我也告訴了索可里尼科夫，關於我和陶慕斯基的談話。陶慕斯基和我談話時，曾說：「我考慮組織暗殺是必要的……但我必需和我的同志們——儒可夫和布哈林商量一下，以後，我可以給我們三人的整個答覆」……」

五 被告拉迪克最後的發言

已審後，未宣判之前，照例每個被告都有最後一次發言權。這裏我只摘錄拉迪克的最後發言，因爲這發言很有公諸世人之必要。

「法官們……我跟着托洛斯基跑，不是因爲托洛斯基那一點點理論，好久以前，我就知道他的論理之腐臭性，也不是因爲我承認托洛斯基是個有威權的領袖，只是，因爲沒有另外一個

組織，我可以依賴而達到我的政治目的，而這種政治目的，是我所渴望的。

「……但是，我不願隱藏秘密，假如我把真理掩蔽起來而帶到墳墳裏去，像加門尼夫那樣，像季諾維夫那樣，像木拉奇可夫斯基那樣，於是，我將聽到在將來為戰爭所犧牲的人民們未死之前對我的咒罵，而這些人我能用我的供辭拯救他們，意義呢，就是為反對正在製造中的戰爭而鬥爭。」

「……我不是為我的榮譽而奮鬥。這種榮譽，我已經喪失了，我是為我的供辭真實性而奮鬥。有些和我在一起的罪犯，他們回到托洛斯基的道路，是為相信「在一個國家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我回到托洛斯基的道路，只是因為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我害怕社會主義建設之困難。」

「托洛斯基派，從前是站在不相信「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所以，就必須的去煽動西方的革命，現在他們覺得西方的革命已不可能了，所以要摧毀一個國家的革命，消滅在蘇聯的社會主義。」

「法官們！我現在必須說出這一幕——我們所召集的會議而爲什麼我們未召集成功我將說出這些，因爲，這或者對將來有重大的意義。

「我要說到德瑞茲，他曾有七八個月的時光，不在莫斯科，並且也未依照我的函約，而來參加會議，後來他到莫斯科也未和我們會面——他於一九三五年來過莫斯科——這對我清楚了，托洛斯基看出我們對他的敗北路線懷疑了，他又在「平行總部」而外，建立了新罪惡——這意思就是有什麼第三組織，已在這裏行動着。

「並且最後當庇亞塔可夫從外國回來，他透出一點暗示，說這已經有新的組織了，但是我聽說沃爾拜格的名字，我會問別人是否知道沃爾拜格的實際，關於他，我們任何人也不知者，這對我又是很清楚的了。托洛斯基在這裏建立的除了「經過他自己的學校」的組織以外，還有另外一個「經過德國法西斯學校」的組織。

「我得覺我是有罪的，雖然我承認了我的罪惡，並且暴露了我們的組織，可是，我還堅定的拒絕關於布哈林提出任何證據，我知道布哈林的情形和我同樣的毫無希望，因爲我們的罪惡，

即使不在法律上，也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但我們是親密的朋友，而且「文字交」的友誼是比較其他友誼更有力的，我相信他應當供出真誠的口供……和我們其他的組織一樣，我盼望布哈林自己放下他的一雙手。

「……我們必須告訴法國的，西班牙的，並其他各國的托洛斯基派：俄國革命的經驗，顯示出托洛斯基主義是工人運動一種毒菌，我們必須警告他們，他們若不學習我們的經驗，他們也將支付他們的頭顱。」

「最後，對整個世界為和平而鬥爭的人們說：托洛斯基主義是戰爭煽惑者的武器，我們必須用強烈的音調，說出這點，因為我知道得是異常清晰的。」

六 判決書的主文

1. 庇亞塔可夫
2. 塞列布里可夫

托洛斯基派反蘇聯「平行總部」的會員，他們組織並直接領導賣國的、奸細的、破壞的、恐

怖的行動，處以極刑——槍決。

3. 摩拉洛夫
 4. 德洛勃尼斯
 5. 利夫什茨
 6. 包古斯拉夫斯基
 7. 克尼亞
 8. 拉達依查克
 9. 諾爾金
 10. 謝斯托夫
 11. 杜洛克
 12. 普森
 13. 葛
- 節夫
拉石

他們是上述各罪的組織者和直接執行者，處以極刑——槍決。

14. 索可里尼科夫
15. 拉迪克

托洛斯基派反蘇聯「平行總部」的會員，對犯罪行動負有責任，但並未直接參加好細的破壞的、恐怖的行動，各處以十年有期徒刑。

16. 阿爾諾里德
- 處以十年有期徒刑。

17. 司托洛依洛夫
- 處以八年有期徒刑。

索可里尼科夫、拉迪克、阿爾諾里德、司托洛依洛夫被處有期徒刑之罪者，並各褫奪公民權五年，所有被判罪者，屬於他們私人的財產，全部沒收。人民公敵托洛斯基及其子塞道夫於

一九二九年被蘇聯驅逐出境，一九三二年被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取消蘇聯國籍，由這次被告庇塔可夫、拉迪克、謝斯托夫、摩拉洛夫等的口供，並由證人洛姆和布克拉特西夫的口供，更由本案所有的證件，判明他們是本案的最主要犯人。如果在蘇聯境內發現他們，立即逮捕歸案。

七 也算結語

這個案件，已經分別執行了。世界公正的輿論，對於這個判決一致的代表同情，蘇聯人民在各城市並會遊行示威，以示對此判決熱忱擁護，由此，我們可以認定托洛斯基派已招得舉世唾棄了。而且在西班牙，在法國，托洛斯基派會用盡心機，破壞人民陣線。在中國的托洛斯基派，更千方百計的破壞抗敵救國陣線，我們不能不懷疑到這是受了托洛斯基的指使。托洛斯基等甘心作法西斯蒂的僕役，甘心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他們資助德國佔領多腦河流域的國家和巴爾幹半島，他們贊助日本佔領整個的中國。當我們全國正努力於團結禦侮之今日，對這些別具心肝者，不能不嚴加防範，這是我遙遙寄語於國人的。

論蘇聯的軍事間諜案

徐冰

蘇聯這次破獲紅軍中的軍事間諜案現在已告了一個段落。以圖哈切夫斯基爲首的八個希特勒的探狗已受了嚴厲的革命制裁，被執行槍決。西伯利亞以及其他方面的紅軍部隊中的托派偵探亦同被破獲。

無疑地，這個惹起世人極大注意的大案件是蘇聯紅軍的大勝利，同時亦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大勝利！

一如西班牙政府軍在瓜達拉牙拉陣綫上擊潰了義國法西斯軍隊的偉大勝利一樣，蘇聯這次破獲的反革命的軍事偵探案是給了希特勒法西斯主義一個嚴重的打擊，把牠近年來利用托派叛徒在蘇聯紅軍中與政府機關中所安置的間諜網掃除淨盡。

西班牙戰爭給了我們一個嚴重的教訓。當人民陣綫的內閣組成時，人民陣綫中的右翼份子不顧共產黨的一切善意的忠告，對於那些將軍們如弗郎哥、薩紐拉、慕拉及哥德司等採取了

寬容態度，給德義法西斯蒂留下了很好的工具。結果，德義法西斯蒂的魔手經過這些叛軍領袖伸入到西班牙的各處，燃起了殘酷的戰火。對於法西斯蒂軍官們這一「寬容」的態度所付的是三十萬人以上的生命的代價呵！這還不夠，西班牙人民陣綫政府未聽從共產黨的忠告，對托派叛徒的活動，始終未採取嚴厲的制裁，結果托派叛徒利用了這種優容的機會，趁着政府軍在前綫最吃緊的時候，在卡塔羅尼亞省舉行了幫助德義法西斯蒂進攻的暴動。結果對於托派份子這一寬容的態度是犧牲了多少英勇戰士的生命！這一嚴重的教訓告訴了我們，這數十萬健兒熱血所警醒了我們，應該以怎樣的警覺性與鋼鐵般的堅決性來對付這些非人類的法西斯蒂與托派份子，否則將付以無可補償的重大代價！

蘇聯紅軍內的這些叛逆份子雅哥達，圖哈切夫斯基，雅吉爾，烏堡萊維支，科爾克，埃德曼，費爾德曼，布里瑪諾夫與蒲爾那等等，儘管他們的地位是怎樣的崇高，儘管他們的叛逆活動掩遮的怎樣巧妙，但他們是蘇聯的弗郎克，是希特勒進攻蘇聯的內奸。他們的活動不只是破壞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暗殺蘇聯的革命領袖，而且挑起世界戰爭，壞破世界和平。且看他們的罪名，伏洛

希洛夫在他頒佈的軍令裏說：

「內務人民委員會所發現之反革命的法西斯的軍事組織是極端祕密的，且存在了長久的時期。這些叛徒們企圖暗殺黨與政府的領袖，對於國民經濟與國防施行一切可能的萬惡的破壞工作，企圖葬送紅軍的實力。佈置紅軍在未來戰爭裏的失敗。他們出賣國際的軍事機密與蘇聯敵人，斷送紅軍的榮譽的力量，並進行一切活動以加速外敵對於蘇聯的攻襲。他們企圖着在戰爭時對於前綫上物質的供給以及一切戰爭行動用他們的叛變行爲，直接叛變與破壞行爲來達到紅軍的失敗與蘇維埃政府的推翻。」

「……這些匪徒的終極目的是在蘇聯不惜以任何代價與一切方法取消蘇維埃制度，推翻工農的政府，以恢復地主資本家的統治。」

這是多麼萬惡不赦的罪行！這些叛徒們在其他國家裏，如我們國內的漢奸親日派與托派，法國的多里沃及洛克上校那些公開執行希特勒命令的匪徒，西班牙的托派份子等等，或會受到寬容的待遇——但這些國家將償付牠們的必要的代價！——甚至被恭奉爲反對民主自

由與共產黨的上賓。但是蘇聯是與這些國家不同的，牠是工農大眾自己管理的政權，是有三次大革命的經驗與二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成績的國家，牠有着高度的警覺性與鋼鐵般的意志，來打碎任何破壞蘇聯的匪徒的頭顱。這一次案件證明了史太林領導下的蘇聯人民的統一意志，證明了蘇聯紅軍的堅強的戰鬥性與敏銳性。蘇聯紅軍是無敵的，伏洛希洛夫會這樣英勇地說過，這句話就是法西刊物亦不得不承認，雖然他們是以那種極端憤慨的詞語。

當這些叛徒被蘇聯人民給以無情的審判，執行了槍決時，德國希特勒匪徒們，托洛斯基及他的徒子孫們，當然是惋惜不置的。德國的法西報紙以及在墨西哥繼續作惡的托洛斯基的文章都在異口同聲地——看呵，「極左」的托洛斯基與極右的法西斯蒂是異口同聲的呵！——悲歎蘇聯紅軍失掉了「最優秀的最有軍事天才的領袖」，蘇聯的政治保衛局失掉了牠的「領袖」雅哥達，把蘇聯紅軍與政治保衛局這兩座保衛蘇聯的堡壘，墮入骨髓的希特勒與托洛斯基竟替紅軍與政治保衛局惋惜起來，這不是曠古奇聞？這是他們自供出來，這種「領袖」是希特勒與托洛斯基的怎樣忠實的工具！

看呵，托派匪徒在蘇聯紅軍中與政府機關中掩藏了這樣久，斷送了多少蘇聯紅軍與工人幹部的寶貴生命，出賣了多少軍事機密，這些都是雅哥達與圖哈切夫斯基那些「領袖」的最大功績，對於萬惡的法西斯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最大功績呵！但是，希特勒與托洛斯基所認為的「最好領袖」是被史太林領導下的蘇聯人民的鐵腕剷除了，而這些「領袖」的剷除誰也應該認為是蘇聯之福，亦是世界和平之福！

還有一些不懂政治只問「人道主義」的人們以及被尖銳的階級鬥爭嚇昏了頭的人們，把蘇聯的這種軍事間諜案誤認為個人爭權的私鬥，以為是史太林伏洛希洛夫與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私鬥。這種腐朽的謬見只是表示了他們對於蘇聯與對於階級鬥爭的無知，表示了他們自己是怎樣沉溺在個人主義的權利思想的泥坑裏。蘇聯是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建立無階級的社會的國家。在那兒只有蘇維埃人民的共同利益，那兒沒有甚麼個人的權利思想，沒有個人的特殊利益，這些只是私有制度的社會下的腐朽產物，而蘇聯是早已把這種萬惡的私有制度掃蕩淨盡了。再具體來說，聯共中央與蘇聯政府的任何行動以及史太林同志的任何行動都

是代表着蘇聯人民的利益，代表着社會主義的利益，同時亦是時代代表着全世界被壓迫與被剝削者的利益。這次的案件消滅了法西斯蒂與托派殘餘更是代表一切主持正義的人們保衛世界和平的利益。有人在談論人道主義嗎？好的，這些叛逆份子每個人手上都塗滿着蘇聯人民的血，他們的叛逆行爲將引起德日法西斯蒂對於蘇聯的進攻，因而將犧牲更多蘇聯人民與全世界人民的生命，那麼這些份子的消滅不是保衛了蘇聯人民大衆更多的生命嗎？要談人道主義時，至少應該從這方面着想！

有人認爲這個案件是『獨裁』統治下的產物嗎？這同樣是一種無恥的侮蔑。相反地，這個案件是證明了蘇聯徹底的民主與平等。一個元帥，七個將軍與一個內務人民委員長在法庭上被審判，被處以嚴厲的制裁，這說明了甚麼。這說明了蘇聯內沒有崇高到不受蘇維埃法律的約束的等級，即使在過去有功於革命的領導者亦不能把他的功績作爲他今後作反蘇聯活動而不受法律制裁的護符。難道這些叛逆將軍對於革命盡過一些作用，現在是有着崇高地位的禽獸，便不應該受社會主義法律的制裁？不要把蘇維埃民主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混爲一談。

在資產階級國家裏對於任何有着高級地位的壞蛋們是充份自由的，但這與蘇維埃民主毫無相同之點呵。『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在中國歷史上只是用以欺騙老百姓的甘言，在蘇聯的這次案件中却充份地證明了而且實行了！

史太林指示了我們，『……托洛斯基主義已不是工人階級中的一個政治派別，現在已經變成了外國偵探機關所僱用的匪徒偵探，破壞者，危害者和殺人犯底卑污的無原則的匪黨了……』這在這次的反革命的軍事間諜案又得到更有力的證實！中國的托派漢奸也是這樣的呵！誰也不能否認中國沒有弗郎哥或圖哈切夫斯基一流的人物，甚至這些東西正是爲了自己的高官厚祿公開地或祕密地把中國出賣給我們的大敵——日本帝國主義。殷汝耕石友三之流過去不是中國政府的官吏嗎？托派份子張慕陶之流不是還在自詡爲『道地革命者』嗎？這些東西雖然沒有像弗郎哥或圖哈切夫斯基那種崇高的地位，雖然還是在到處招搖撞騙，匆匆在軍閥政客的前門搖尾乞憐，但他們却實與圖哈切夫斯基一樣給德日法西斯蒂作着忠實走狗呵。這些走狗的反對民族統一戰綫的言論以及種種挑撥內爭的言論在替誰盡着作用，

不是很明顯的嗎？被披露出來的日本特務機關關於山西工作的報告書裏不是在盛讚這些『左的』『高明的』托派份子嗎？

我們何必再浪費我們的筆墨，托派已不是甚麼政治派別了，他們已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良好工具，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對付這些叛逆份子只是警覺的頭腦，敏銳的眼光，無情的鐵拳與堅決的鬥爭！

托派在西班牙和美國的罪行

吳明

托洛斯基派已墮入到與人類中最黑暗的法西斯勢力爲伍，到處一樣用口密腹劍陰險狠毒的手段，用違反人類爲人道德的行爲來出賣祖國，勾結外敵以求達到他們罪惡的目的，這已經由托派在蘇聯進行暗殺黨政領袖，勾結德國法西斯和日本帝國主義，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種種陰謀之事實及在中國托派破壞人民反日統一戰線，瓦解抗日隊伍，謀害紅軍幹部等等陰謀事實充分證明了。其實，托派這種卑鄙醜惡，在世界各國的托派組織，都是一樣。只就在西班牙及美國托派的罪行略加申說，便可舉一反三，推類至盡。

在西班牙，托派在巴斯龍尼亞列里德，卡達龍尼亞等地組織有所謂「馬克思主義者聯合工黨」自內戰發生後，便不斷或明或暗進行其勾結法西斯，破壞人民戰線活動，及見人民戰線爲衆意所歸，托派乃揚言也贊成人民戰線，托派見人民自衛軍運動風起雲湧，也就組織其所謂人民自衛軍，這樣來鑽入人民戰線，混入人民自衛軍，來實行其陽奉陰違，從中破壞的手段。却是，

托派賣國求榮的陰謀，不久便爲事實所揭穿，在亞拉干斯基戰線的陣地上，本來有由托派組織之所謂「人民自衛軍」三團，由托派領袖指揮，但當着人民自衛軍正與法西斯叛軍作殊死戰的時候，托派的「人民自衛軍」竟於緊急關頭，故意放棄極重要的陣地，只剩下人數不多的國際軍德爾曼隊孤軍苦戰，因而蒙受很大的損失，死傷過半。在這一戰線的另一陣地上，托派的「人民自衛軍」也是同樣的臨陣逃避，給法西斯叛軍以極大便利。在中心戰線上的西古安斯陣地上，托派「人民自衛軍」也不管其他人民自衛軍的反對，竟自動離開陣地，法西斯叛軍乃得乘機進攻，只是由那一陣地的鐵路工人的自衛軍英勇抗戰，才把法西斯叛軍打退。又如托派看到協助西班牙人民的國際義勇軍英勇抗戰的結果，在西班牙人民中和在國際上都博得了極好的聲譽，於是托派就在自己的機關報「紅色戰友」上極力宣傳謂在協助西班牙人民戰線的國際軍中有許多托派份子的參加並如何英勇作戰，企圖用這樣的手段來欺騙廣大羣衆以掩蓋他們的破壞人民戰線的罪行。但經各國記者詢問國際義勇軍指揮官該軍內是否有托派份子參加作戰，該指揮官等均一致否認有托派份子的參加的事，並謂托派宣傳，只係一種空氣作用。

這些鐵的事實，好像照妖鏡一樣，把托派破壞人民戰線，破壞人民自衛軍之盧山真面目，照無遺。托派陽奉陰違的罪行還不只此，他們還在西班牙各地組織恐怖團體，進行暗殺人民自衛軍領袖和積極的幹部等。譬如因為卜達龍尼亞社會黨機關報會揭破托派破壞人民戰線，勾引外敵，出賣民族利益的陰謀與行為，托派乃派其武裝暗殺團，先到該報館示威，並警告該報若不停止對托派之攻擊，則將有「嚴重結果」。不久也就發生托派謀殺團害卜達龍尼亞社會黨書記加莫烈拉氏的案。在此以前，托派的暗殺團曾在馬德里殺害了人民戰線的積極份子與領袖，還有在與法西叛將作戰時，托派在後面開槍射擊人民自衛軍的事實。這些罪行是各報屢有登載，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據各報載，托洛斯基曾致親筆信給西班牙的托派，指示：

(一) 須公開反對人民戰線；

(二) 須公開反對蘇聯。托派中一部份人接得托氏指示後，以人民戰線為西班牙人民所擁護，蘇聯為西班牙人民所愛戴，若貿然公開反對人民戰線與蘇聯，必將觸眾怒而招羣疑，必將

托派在西班牙和美國的罪行

使西班牙人民認爲托派係直接協助德意之法西斯和佛蘭科叛將來出賣西班牙祖國，不如暫時仍順風掛帆，以俟時機。托派會將此意轉達托洛斯基，請其斟酌；但托洛斯基復信堅持在西班牙之托派必須毫無條件地立即執行其指示，並謂各種方法都要同時並用。自此以後，托派更其厲害進行陽奉陰違，口蜜腹劍。手段，同時，托派的機關報每日所攻擊的不是法西斯叛將，不是德意法西斯，而是人民戰線和蘇聯。前曾以贊助人民戰線之假面具來要求參加卜達龍尼亞政府之托派領袖寧恩氏（別名斯波列的，曾爲托洛斯基之書記，現任西班牙托派組織之祕書）及其屬下囉嘍們就實行托洛斯基的指示，在會議上造謠譏諷，對人民戰線大肆攻擊，到處放謠流言，污蔑共和國政府，反對將人民自衛軍改編爲正規軍之設施，寧恩並在列德里的會議上破壞其本人所曾經舉手贊成通過的法令。寧恩這樣毫無人格，公開反對人民戰線出賣祖國的行爲，結果有卜達龍尼亞各政黨人與組織的一致要求，將寧恩驅逐出卜達龍尼亞政府之外。

我們把目光由正在與法西斯作殊死戰的西班牙轉去看比較「平安無事」的美國，則托派在那裏也是一樣的極其卑鄙齷齪，陰險狠毒的。遠的且不講，自從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的暗

殺總部被蘇聯當局檢舉以後，托洛斯基等勾結德法西斯，出賣祖國，刺殺蘇聯人民領袖基羅夫及謀殺史太林及其他黨政要人之罪行敗露以後，美國的托派，公開同情於托派在蘇聯的罪行，並說蘇聯判決托洛斯基與刺殺案件有關，實是一冤枉。托派乃運用其兩面派的慣技，暗中引誘某些名人和社會黨領袖等，發表『中立無偏』的宣言，並設立所謂『辯護托洛斯基委員會』這樣來「證明」托洛斯基「冤枉」，洗刷托洛斯基的罪行，以為托洛斯基及托派繼續活動的餘地，却是這種手段，未曾做得高明，大家都知道並證明，這一宣言在紐約城內托派機關內印發出來的；至於所謂『中立無偏』却又公開為托洛斯基「辯護」，馬腳畢露，大受社會人士之非議，目托派為『未熟練的陰謀家』。最近美國托派發生內訌，把托派內幕揭出，更使人明瞭美國托派和其他國內托派一樣，都是極其危險的。據最近聲明脫離托派的亞諾爾德·約翰生氏在工人日報登啓事說，托派領袖斯畢克特與片恩二人，會赴娜威向托洛斯基請示，於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回抵美國，曾在斯克特私宅中開托派首腦秘密會議，會上由斯畢克特報告，謂托洛斯基贊同在蘇聯的反革命活動和採取暗殺手段等。托洛斯基認為推翻『以史太林氏為代

表之政府』之唯一辦法就是實行反革命。托洛斯基並聲明必須用暴力的反革命云。此一揭露，不獨更加證明托洛斯基實係托派在蘇聯的罪行之首腦，而且揭露了美國托派的欺詐行爲。同時美國的托派也與其他各國一樣與反動勢力合作，極力反對人民戰線，美國的托派組織「打手隊」去搗亂美國人民反戰爭反法西斯的會議與示威，向警察及移民局告密使得逮捕及驅逐反戰反法西斯的積極份子，這都是大家共曉的事實。還有，在美國的托派和在中國的托派派同一鼻孔出氣，攻訐中國人民反日統一戰線，並也流露出「聯日反蔣」的漢奸理論，隨時隨地偵探積極於反日救國運動的華僑同胞並向警察及移民局報密，而且還有公開恐嚇及毆打這些僑胞的惡行。

上面所述，不過是在西美兩國內托派種種陰謀暴行的大概，然由此已可見採取陰謀暴行是整個托派的無恥的反動的「政策」，從此可見托洛斯基派到處一樣都已成爲人類道義的公敵。

杜威委員會「審查」托洛斯基案的真相

Hammets & Smith
蓉恬譯

上星期中，我們在托洛斯基的私宅裏（可約漢 Coyocacan, Mexico 的一個風景秀麗的別墅是屬於利瓦 Rivers 夫人的，由警察周密地保護着）的「法庭」的記者席上，佔得一個位置，旁聽以杜威博士爲主席的所謂「公正」審查委員會的審查。

我們能進去旁聽是不容易的。我們中有一人是拿的墨西哥著名報紙「民族」的證明文件；另一人是拿的「人民報」的名片。這便使得委員會裏擔任宣傳工作的威爾克夫婦（Mr. and Mrs. Charles Rumf ra Walker）大起疑心。

「抱歉得很，」奧爾克夫人說，「但是我們只能接待兩個「民族」記者，特別是因爲它昨天對我們有極壞的言論。」威爾克先生甚至更直率：「你將爲人民報供給什麼樣的稿子呢？」他問道。「你們的編輯，巴爾麥（Frank Palmer）不是一個共產黨員嗎？」（原編者註，巴爾麥並不是共產黨員。）經過好久的爭執才答應我們進去，但是首先我們即被搜查有沒有手槍，結

果是沒有搜到。

「法庭」的房間很大，一張長桌的上端坐着審查的委員們，杜威和比爾斯（Carlton Peals）均在座。此外還有斯脫堡（Benjamin Stolberg）和納福勒蒂（Suzanne La Follette，紐約著名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原編者註）及一個叫做奧吐魯爾（Oto Rühle）的德國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另一張桌上坐着托洛斯基自己。看起來，他比我們所想像的他年輕些——一個儼然自以為了不得的神氣活現的人。四個秘書和他坐在一排。對着他的一張桌上，坐着他的辯護律師果爾德曼（Albert Goldman，是芝加哥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和扮演「檢察官」的弗勒蒂（John Finerty，是華盛頓的律師）。

「法庭」和旁聽席用一條欄杆隔着。在三十個旁聽者中，有短胖的利瓦先生——墨西哥的名畫家，托洛斯基的朋友和信徒。半德國種的利瓦夫人，穿着墨西哥城市的婦女僅在跳舞會和節宴日才穿的禮服。瘦而黑的祕魯產的伯爾斯夫人坐在她旁邊，含着笑容。其餘的人是新聞記者和一班自稱是委員們的朋友的人。紐約時報的克魯克漢（Frank Kluckhohn）也在這

裏，委員會並不怎樣招待他；後來他告訴我們，是因為紐約時報在審查未舉行時前幾天登過一篇爲托洛斯基所不喜的文字。墨西哥的記者甚爲尷尬，因為他們聽不懂用英語進行的「訴訟手續」，委員會又拒絕接受用西班牙語翻譯的要求。會中沒有墨西哥的團體參加。民族革命黨，墨西哥勞工聯合會和共產黨，均將請帖置之不理，未派代表出席。

在開始審查時，杜威博士先誦讀宣言，說明此次審查的理由。宣言的主點說，委員會「秉公正態度；它認爲全世界的正義絕不相信托洛斯基確會主使顛覆蘇聯或曾與德日同謀進攻蘇聯。宣言又說，托洛斯基不能投到任何法庭去爲自己辯護，因此應有某種審查以證明他的無辜。杜威博士又說明審查會不能在一個大的公共場所舉行的原因，是因為委員會不願多累墨西哥政府須用特別警察隊來保護托洛斯基的生命。

托洛斯基先由他的辯護律師果爾德曼審查。所謂審查，就是托洛斯基把他的「俄國革命史」一書中的話述一遍。

托洛斯基的證據分爲兩個主要部分：（1）從人格上說，證明他參加賣國和反革命的活

動，在道德上和心理上都是不可能的。(2)從「實際的事實」上說，由於環境及「文件」之昭示，托洛斯基並未與莫斯科的被告有過會晤和勾通。

托洛斯基並未提出他所預約的新的和驚人的證據，他僅僅把自己已經在哈斯特的及其反動的報紙上發表過的話重述一遍。陳述於「公正」審查之前的所有「證據」或是托洛斯基自己提出的，或是他的朋友，信徒，黨徒，和秘書提出的。並沒有絲毫的企圖去駁倒托洛斯基被那三十三個人株連於反對蘇聯的賣國陰謀的證據；這賣國陰謀的口供，是使他們許多人喪失了生命的。

托洛斯基從人格上的辯護有二個重要點：第一點認為，從托洛斯基的「長久和光榮的」革命領袖的歷史以及他所發表的許多的反對個人恐怖主義的言論，可以證明這樣的一個人絕不會犯到像莫斯科審判所定他的譴，第二點認為，托洛斯基在陰謀中的同黨——加米涅夫，齊洛維夫，拉狄克和其它的人——由於他們的「投降」史太林的政權，曾受過托洛斯基的咀咒和痛恨。因此托洛斯基爭辯說，和這般自卑人格的人合作，在他是絕不可能的。

所有這些「證據」和在莫斯科審判的時期中托洛斯基在報上所作的否認的話多少是一樣的。他並沒有新的事實提出。爲加強這些辯論，辯護律師果爾德曼便把他所記錄的托洛斯基的書和論文以及列甯的各種言論中的話拿來當衆宣讀。當一九一八年托洛斯基指出調和布爾雪維克和孟雪維克在政綱上和觀念上的分裂爲笨拙的，無效的企圖時，列甯不是說過「托洛斯基是最卓越的布爾雪維克之一員」嗎？

很明白的，這個所謂證據的主要點，便是在把托洛斯基和列甯拉在一道，而把史太林和其它的蘇聯的領袖們排斥在一邊。爲回答別人對他會經常攻擊列甯的指摘，托洛斯基或承認是他的錯誤或辯護說他和列甯不同之處並不大。托洛斯基的這種自鳴得意的態度，便在辯護律師哥爾德曼的訊問和弗里特的「盤問」下巧妙而周詳地刻畫着。

在休息片刻時，便聽到弗里特對美國一個通訊員誇耀地說，「當時我真的提了一個極困難問題，呵！那個人太聰明了，他很巧妙地將這問題避開。」

審問給托洛斯基描畫的一幅美好的畫像，在同時它又力求把牽扯托洛斯基的莫斯科

的被告們給以污染。哥爾德曼把被告的名單唸了一遍，便叫托洛斯基「把你所知道的每個人的事告訴委員會。」托洛斯基的回答是，齊洛維夫，加來涅夫，和比太可夫都是「中央政治局（G. P. U. 音譯爲格伯烏）的中堅份子」，拉迪克是一個「以口代腦」的人。他繼續輕蔑地描畫拉迪克是「一個有新聞記者特性的新聞記者。他今天聽見什麼，明天就寫什麼。」

托洛斯基會進而斷定說，它早已預料到比太可夫碰到第一次危急的事就會出賣他自己的。又說拉迪克在一九二三年崇拜過他，而十三年後却攻擊他。其它莫斯科的被告們都曾做過孟雪維克或「資本主義的走狗。」似乎祇有托洛斯基一個人是俄國革命中的白玉無瑕的人。像是一「證據」似的，那種巧弄言語的問題是三翻四覆地在提出：「最卓越的布爾雪維克之一」的里昂，托洛斯基能和加米涅夫，齊洛維夫，和拉迪克這樣的壞蛋聯合以及和他們同謀反革命嗎？

托洛斯基告訴委員會說，自一九二八年後他的黨徒由於陸續的「投降」而「沒落」，他已宣佈和他「以前」的同伴永遠斷絕。他更決斷地說，自一九二七年底以來，他就沒有和莫斯

科被告中的任何個人再有過會見談話和通信。這些話是由辯護律師果爾德曼的直接訊問而來的。當問到他是否曾和各個被告通過信時，托洛斯基便叫喊道「絕沒有！」——有時甚至問題還沒有完，他便叫了起來。委員會便不得不警告托洛斯基，要他等到問題問了再回答。對於這點，像對其它各點一樣，委員會所聽到的僅是托洛斯基的話。

然而在另一方面，托洛斯基却證實了莫斯科的審判。他向委員會高聲的訴說，他否認主張恐怖主義，但是他承認贊成傾覆蘇聯政府。他說蘇聯的「官僚政治」僅能用一個新的政治革命一把它推倒。要是蘇聯政府反對羣衆，那便要採用一個暴力來對付了。托洛斯基又聲辯說，他並不「餓渴於權力」，不過他認為權力在蘇聯倒是一種必要的害物。他解釋說，當你的主義勝利了，「你必須握到權力」。他更繼續說，蘇聯政體「與資本主義接近，正和牠與社會主義一樣」；它有一種「新的雙重作用，保持新形式的財產，以及對資本主義並維持官僚政治所剝削的新形式的財產。」

托洛斯基進而宣稱，史太林必須「打倒」，不過不須殺死——假若他不反對羣衆運動，他

說，蘇聯的成功要依賴世界革命。一個沒有革命性的世界大戰，「結果便是蘇聯的失敗。」

在他的陳述中，托洛斯基幾次提到要在蘇聯來一個「新的革命。」他說：經過一個長久的時期，我都以為用和平的手段來改革是可能的，但是自從希特勒第一（譯者按：即指史太林）勝利後我便確信蘇聯共產黨從它最大的失敗中，已絕無能力來貫徹它的主張。我們必須在蘇聯提出「一個新革命的口號。」這些話在旁聽席中的非托洛斯基主義者的人看來正證實了像莫斯科審判的判決。

審查委員們問了托洛斯基一些問題。納福勒蒂的偏袒，甚至杜威博士都不以為然。

「托洛斯基先生，」納福勒蒂夫人說，「這件事或許不大重要，但是許多人會問到我這點，而我也想問問你：要是你處在史太林先生的地位，莫斯科審判，會不會是一樣，以及你會不會像他那樣對付那些罪犯呢？」

托洛斯基沒有得到回答這個「公正」的問題的機會，因為杜威博士打斷話頭說：「我們不希望知道托洛斯基先生個人的意見，除非它與證據有關係。把這個問題從記錄上劃掉。」而

後來，委員會却給了托洛斯基許多機會讓他對幾樁事情，包括西班牙的內戰，發表他個人的意見，而這些都與證據沒有關係的。

托洛斯基的許多答語，是根據他自己的著作和論文而成的，那些書，托洛斯基再三地說「是已經翻譯成許多許多國的文字。」在有一點上，他費了很長時間來證明，他的一本書在莫斯科審判中被檢察官維省斯基（Vyshinsky）指為是「小冊子」的著作，並不是小冊子而是一本大著。他叫秘書去拿了一本來，並請委員會注意它有一百〇六頁。委員會並未去管它應屬小冊或屬大著。

對於許多重要事件，托洛斯基的回答不是含糊其辭，便是自相矛盾。譬如他的辯護律師問他在蘇聯當一個人犯罪時，他的全家即被連坐，或處以酷刑，或置之死地，這是否是真的，托洛斯基回答說，這確是如此。杜威博士便問：「關於那種事，是不是有一條成文的法律？」托洛斯基躊躇一下說，他相信有這樣一條法律；並且說，他知道這條法律已經在幾百樁案件上實行過。再問下去，所謂幾百樁案件便變成了兩件，一件是一個瑞士人，另一件是一個叫做斯爾吉的法國

人（Victor Serge是法國著名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原編者註）的案件。

委員會似乎接受了這個敘述，作為托洛斯基的辯論的證據。過後，托洛斯基又舉出他的兒子斯爾基（Sergei）最近在蘇聯的被捕的事為例證，他說他的兒子是一個數學家，對於政治毫無興趣。接着又說，斯爾基因為他對政治沒有興趣，所以認為可以安全地居留蘇聯。那似乎和托洛斯基前面的話有點矛盾，假若蘇聯有一定法律規定一個人的家屬要擔負犯罪的責任時，那麼，托洛斯基的兒子如何能夠安全地留在蘇聯呢？

從開始審查時起，這個所謂公正委員會便現出一種分裂的情形。比爾斯是一個例，他歡喜提出麻煩的問題。比爾斯說在一九一八年時托洛斯基和其它幾個人準備把俄國的領土讓一部分給德國。因此，托洛斯基今天是不是不可能地考慮到那個計劃呢？這是審查時托洛斯基第一次感到極端的狼狽，他說，絕不，絕不；以前那個計劃是為拯救俄國以建設社會主義；那是一個值得的犧牲，今天則完全不同。接着他憤怒了，他喘喘地說，一個說了和做了他一生所說所作的人，絕不可能想到這樣的事的。要是那樣，便變成了雙重人格。「但是，」比爾斯堅持地說，「你認

爲史太林的政權是一個官僚政治和反馬克斯主義的。」對於這點，托洛斯基又回答說，他的「一生就是他的動機和行爲的純正的證據。」

關於他的「祕密文件」，托洛斯基再向委員會確言委員會可以完全看到。自然他不能當着所有這三十個人的面前說出他的文件收藏的地方。在哪威的國社黨員會已盜去他的文件的一部；格柏烏特派員在巴黎盜去其它部分。不過他要私下告訴委員會其餘的文件在那裏，他們可以看看和審查一番。這些寶貴的祕密文件之一，最後拿出來作爲證據的，是厚厚的一冊「戰鬥」(militant)——在紐約的托洛斯基機關報，譯者按最近已停版)的合訂本。裝訂得很漂亮的。

比爾斯再三提出些殺風景的問題。他要想知道，「托洛斯基先生是否可能把那些可以連累他的文件毀掉呢？」呵。那不能夠，托洛斯基堅決地說。那是絕對不能夠的。因爲假使可能毀掉的話，那麼他的文件便覺不關重要，名不符實了。這點人們也必得相信托洛斯基的話。

在審查第二天時，比爾斯和委員會間的分裂更大。比爾斯宣稱杜威博士第一天代表委員

會全體所作的宣言，很多地方不能作為他，比爾斯的意見。事實上，委員會起草宣言時，並未徵求過他的意見，然後比爾斯接着宣讀他個人的宣言。他說，它之參加委員會，是因為他覺得一個被控訴的人，應給他一個為自己辯護的機會。但是得明白說明，他對任何政府和任何黨派都沒有成見。他不同意委員會的宣言，說是在莫斯科審判中所判決的人的有罪或無罪與在墨西哥的審查毫無關係。不管你對莫斯科審判的意見如何，比爾斯說，委員會是應該謹慎從事的；假若委員會認為托洛斯基無罪，那麼委員會便是責備蘇聯冤枉了一個無辜的人。

杜威博士立刻跳了起來。他說，起草委員會的宣言未徵求比爾斯的意見，是因為比爾斯不在，故無從徵求。比爾斯反對說，他曾在那裏，不過他未能被邀請。過後，它們又看見納福勒蒂非難比爾斯的不慎重。當天午後，杜威博士則說，是他的錯誤，並向比爾斯道歉。那天會完後，比爾斯便沒有和其它委員們同車回家。

在審查的第二天時，比爾斯問過托洛斯基，他曾要求從墨西哥引渡到蘇聯親身到庭的事，是否是真的。是的，實有其事；托洛斯基有這樣的一個請求；他曾在許多報紙發表過，蘇聯當然

已經看到。但是，「比爾斯堅持地問：「蘇聯和墨西哥既已斷絕外交關係，引渡是可能的事嗎？」檢察官」弗里特忘記了他所處的地位，便跳起來爲托洛斯基辯護。他說：雖然沒有外交關係，引渡却是可能的。在「審訊」時檢察官爲被告作辯護，這並不是僅有的一次。

在比爾斯與弗里特大興舌戰中——四月十二日整個午後都是這樣——在旁聽席中的里互先生在喧嘩聲中安閑地睡着了。有二次別人不得不輕輕地推着他，因爲他的鼾聲把發言人的聲音都蓋着了。

當審訊繼續下去時，托洛斯基更是反覆其辭，矛盾百出。托洛斯基知道莫斯科的被告之一的那個名德里齊（Dreiser）的人嗎？托洛斯基說，「知道的，他是後起的人，一個年紀較青的紅軍，一個後起之秀。」然而過一息，當杜威博士問他德里齊是否會作過他的保鏢時，托洛斯基不僅自相矛盾，並且還說出些似乎是完全不足信的事。好像是托洛斯基並不知道德里齊那個後起之秀，是否曾作過他的保鏢。托洛斯基解釋說：「許多願意保護我的人，他們投我而來想担我任的保鏢的職務，但是我不知道它們任何一個人的名字。」

同樣的，關於布龍金（Bumkin）的問題，托洛斯基的回答也是矛盾其辭。他首先敘述布龍金如何給格柏烏捉到和槍斃的事。爲使委員會對這幕悲劇留下深的印像，他便描述布龍金是他的親愛的朋友。過後，在回答另一問題時，托洛斯基又說他和布龍金僅有一面之緣，而且會見的時間極短。

關於斯吉爾的問題，托洛斯基一樣是矛盾的，第一天他曾舉出斯吉爾的名字，作爲他所說的蘇聯有一條株連罪犯全家的法律的例證。在第二天審問時，托洛斯基說他知道斯吉爾其人，但是斯吉爾並不是一個托洛斯基主義者。然而在那天審問快要完的時候，托洛斯基又說出另外的故事來。它說它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住的房子很小，僅有五六個房間。托洛斯基「隱姓埋名」住在那裏，但是去會它的人有數十個——托洛斯基說斯吉爾也是其中之一。托洛斯基確切地說，賀爾茲蒙（Holtzman）伯曼優里（Bernun-Yuri）弗里茲大衛（Fritz-David）或莫斯科審判中的任何被告，都沒有在哥本哈根訪問過他。他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廿五日到十二月二日往來於他在哥本哈根住宅的朋友們的口供等來作「證據」。

「這些口供都肯定說斯多·托洛斯基 (Selov Trotsky) 並沒有到過哥本哈根他父親家，更沒有帶賀爾茲蒙或莫斯科其它任何被告去。這些口供僅是出於托洛斯基黨徒們之口的。」托洛斯基的幾個門弟子證明，他們幾乎天天都聽托洛斯基或他的妻子給在柏林的斯多通電話。

托洛斯基盡其所有能力來推翻莫斯科被告們所供關於布列斯脫咖啡店 (Britol Coffee) 和斯多與其它同謀者間會晤的話，辯護律師果爾德曼高揮着一束文件，大聲道：「文件毫無疑義地證明而且再沒有絲毫可疑之處。斯多絕沒有到過哥本哈根，沒有和賀爾茲蒙伯蒙或大衛會談過，托洛斯基君也絕不能看到過他們。」所舉出的毫無疑義的證據是斯多的護照上面沒有到丹麥的簽字；托洛斯基夫人拍給赫里歐要求允許斯多到德國去的電報的所有底稿；托洛斯基的幾個黨徒——斯爾基也在內——的電報，上面他們天天在哥本哈根托洛斯基家，並且聽到托洛斯基和他的夫人與他們在柏林的兒子通電話。

「你有沒有電話清單呢？」比爾斯問。

「我們沒有，沒有。」托洛斯基的一個祕書，佛蘭克爾 (Emil Frenkel) 回答說，「我們

住在那裏的時間很短。房主答應我們用國際電話。」

「但是，托洛斯基君，」比爾斯堅持地說，「你說斯多不能夠到哥本哈根看你，因為他的護照沒有丹麥的簽字，但是你承認斯多是非法到柏林的，它能否掉個名字弄到丹麥的簽字，非法到哥本哈根呢？」

托洛斯基僅回答說斯多決不敢這樣連累他父親的辯護律師果爾德曼把阿爾堡（*Ålborg*）在莫斯科的供辭，他和斯多本打算到哥本哈根去，但後來沒有成功的話讀一遍。然後果爾德曼把「今日的蘇聯」（*Soviet Russia Today*）最近刊載的布利斯脫咖啡店的照片拿出來，嘲笑這是「共產黨的謊謬的，捏造事實的慣技。」他引用同托洛斯基住在哥本哈根的朋友的話，證明哥本哈根沒有這樣一個地方，又引用弗爾德夫婦（*Mr and Mrs. B. F. Field*）不久以前還是紐約活躍的托洛斯基主義者，現在則自己另樹立一個反蘇聯的團體的來信作進一步的「證明。」弗爾德夫婦說他們會到過哥本哈根，並且知道大飯店並沒有門通布利斯脫咖啡店，咖啡店離開飯店有好幾個鋪面。我們在記者席上的一部分人便不得不為之驚異，怎樣

又完全承認有這個咖啡店，甚至還靠近飯店。那時果爾德曼律師指着「今日的蘇聯」上面的照片說，明明白白，它是修改過的。

第三天的「審問」完全集中於羅姆（Roma）的問題。辯護律師果爾德曼一直認他是維多羅姆（Victor Romm）而且幾次聲明說，那個「消息報」（Izvestia）的記者的名字是佛萊德米爾（Vladimir）托洛斯基像他以前在報上說的一樣，堅持在莫斯科審判前他沒有聽見過羅姆的名字。事實上他從來不看「消息報」祇有外國人才覺得「消息報」有看的價值。托洛斯基需要蘇聯的消息時，他看「真理報」（Pravda）紐約時報，或祕密情報。

托洛斯基指着壁上的地圖述敘他從君士坦丁堡到巴黎的種種細微的事情，以表明他絕不可能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和羅姆會見。他說他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四日到馬賽，即乘車到聖巴拿（St. Paul's）租定的別墅，他「隱姓埋名」地住在那裏，不過像在哥本哈根一樣又約有五十個人去拜訪他，他的朋友和弟子陳述，一直到十月間和托洛斯基沒有離開他巴拿的住所到巴黎或波德布龍（Bois de Boulogne）去過，因此他如何能和羅姆在七月中會見

呢？並且托洛斯基辯駁說，法國的國家警察緊釘着他的梢。他們的官方報告可以解決一切爭論，因為他們知道他所有的行動。

對於這點，紐約時報的克魯克賀給杜威博士一個紙條問，法國的警察能否報告托洛斯基住在法國時的種種行動。啊呀，不會的，托洛斯基回答說：法國政府絕不願去得罪莫斯科。很明白地，委員會必然是僅僅接受托洛斯基自己所說的話。

關於巴塔可夫乘飛機到阿斯羅（Oslo）去看托洛斯基的問題，也是如法泡製。托洛斯基呈出阿斯羅航空站一個雇員所寫的證件，上面說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三六年五月中間沒有外國的飛機在那裏降落過，因此巴塔可夫如何能在十二月十日從柏林飛到阿斯羅呢？但是不幸得很，這個證件又是非正式的。挪威政府也一樣不願和莫斯科麻煩，而你又不待相信托洛斯基的話。

在休息期間，一個肥胖的，面色通紅的紳士與新羣衆的通訊員辯論起來。他坐在新聞記者席上，靠近我們，我們以為他是一個新聞記者。但他似乎對於此次「審訊」有着深刻的感想，他

簡括地說：「法國革命槍斃人來二十個一次，俄國革命槍斃人來四十個一次，革命都是像那樣的。」這位紳士原來是小說家伐來爾（James T. Farrell）我們有文字根據證明他是屬於托洛斯基黨。後來我們中有一人去訪問審查委員會住的地方，看見他也在那裏。

上星期四晚上的審問時，間被托洛斯基用去發揮他自己的長篇大論，他暢談蘇聯、世界革命，以及它自吹自打的政策。他顯然地想給予資本主義國家一個良好的印象，尤其是美國。

「當你在蘇聯的時候。」果爾德曼律師問他，「你感覺得你不能與資本主義國家往來嗎？」不，托洛斯基從來沒有感覺那樣的一回事，「當你大權在握的時候，你是不是想以紅軍來推翻其他的資本國家呢？」不，永不會的。「在你的著作中，在你私人的意見上，你是不是永遠地反對戰爭呢？」是的，托洛斯基是永遠地反對戰爭；他說，一個政黨愈革命，牠愈不要戰爭。

過了片刻之後，托洛斯基又表示一個稍有不同的意見了。他說假使蘇聯協助了德國的共產黨，則希特勒決不會握到政權的。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員現為托洛斯基派的魯爾（O. Rühle）便利用他的「公正」的審查委員的地位來擁護托洛斯基的言論。比爾斯無論何時發

生一個麻煩的問題出來時，這位「公平的」委員總要發出低聲的怨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果爾德曼又問他的當事人關於西班牙的意見。托洛斯基說。即使西班牙沒有請求俄國援助，俄國也應該盡量援助。而在這個任務上蘇聯是失敗了。這個時候我們真奇怪着似乎托洛斯基對紐約時報都不看，我們一直到了以後才了解他的回答的含意。

我們實際上沒有時間來考慮那件事，因為托洛斯基立即滔滔不絕地大談他的反對蘇聯的起源。公正的納福勒蒂委員顯然地喜形于色，公正的斯頭脫堡委員則點頭稱是。托洛斯基又用他的老套語來攻擊史太林及「官僚政治」，引研究蘇聯問題的權威者奧夫勒赫特（E. A. O'Hanlon）的話來證明蘇聯當局賄賂外國作家。

（奧夫勒赫特在他所著的「蘇維埃聯邦」（U.S.S.R.）一書中，稱該書的譯本在蘇聯出版，他得到八千盧布。後來好萊塢用他的小說The Informer編為電影，他得到更多的錢。原編者。）

以後托洛斯基承認他曾排斥「列寧遺囑」爲偽造的。但是他又說那排斥是一個撒謊，他所以要作這個謊語是由于「外交理由。」「在近代的文明中，」他以訓話的神氣說，「每個人須要時常撒謊。」弗勒蒂問他，他的這個自供是否要寫在此次審問的記錄裏，托洛斯基回答說：「委員會不應該將我當作一個天使看待。」

弗勒蒂以「檢察」律師的地位，代表委員會行四月十六日星期五的開會儀式。稱他與委員們在盤問中，要將托洛斯基當作一個敵對的證人。然而在盤問中，弗勒蒂「檢察官」却在他的權力中，盡各種能力可協助托洛斯基作更有力的回答。在盤問的程序中，弗勒蒂自始至終總是這樣對托洛斯基說：托洛斯基君，你的意思實際上是這樣的是不是？以後這位「檢察官」硬把托洛斯基的原來答詞說成更好的英文，使得這答詞要更有力得多。下列有一個依照原文隻字不動的例子：

弗勒蒂：你的意思實際上是說史太林君已爲他自己所創造的官僚政治所犧牲了，是不是，托洛斯基君？

杜威委員會「審查」托洛斯基案的真相

一三六

托洛斯基：是的，官僚政治現在高于史太林了。

弗勒蒂：換句話說，組成本審問案的人們真能夠另組成一個審問來查辦他呢？官僚政治既

高于史太林君——你是否說是一種（Frankenstein）式的呢？他已經創造了高于他自己的事物嗎？

托洛斯基（高興地）：是的，是的。

後來弗勒蒂問：「蘇維埃新憲法給予祕密投票，你覺得這個結果怎樣呢？」

「大約與德國希特勒的憲法相似吧，」托洛斯基回答道。「人民不斷地期望着希特勒能改革，但是他沒有。」

當比爾斯發出他的令托洛斯基感覺煩惱的問題時，這種的「盤問」便來了許多。假若這天要問的是關於政治方面，而不是關於莫斯科審判案所舉出的罪名的真偽時，那問題倒似乎比較切當的。

比爾斯說：「人家請我問你爲什麼代赫斯脫報寫文章？」

「向來沒有！」托洛斯基大聲喊道。即在莫斯科審判之後發出消息時，我還確切地說不知赫斯脫代表在那裏。」

托洛斯基于是被問起關於他自己所講的「免去史太林」的一語。那語是托雅諾夫斯基大使從赫斯脫報上托洛斯基親自簽名的那篇文章裏引用來的。

「沒有那回事，沒有那回事，」托洛斯基堅持地說。「托雅諾夫斯基應該知道明白些呵。」到了這裏，托洛斯基大攻擊蘇聯駐美大使托雅諾夫斯基起來。

「然而，托洛斯基君，」問者繼續地問，「約一月個以前，在赫斯脫報上有署名「里昂托洛斯基」的文章，你的意思是說那些文章都是沒有得到你的同意而發表的嗎？」

「是的。」托洛斯基回答道。「一切報紙上我的文章都是用我的名字發表的，然而沒有交文章給赫斯脫報紙。」

赫斯脫報紙機關的「全球服務社」(Universal Service)通訊員，坐在新聞記者席上大怒起來。

常常準備着袒護托洛斯基的杜威，插入道：「我認爲這一點不重要，我要問另一問題。」而比爾斯繼續地問托洛斯基：「一九三〇年是怎樣的呢？」托洛斯基設法爲自己辯護。他說：「我有一個宣傳機關。那時我不知道赫斯脫的立場，我也不知道我的宣傳機關幹的是什麼。」

後來赫斯脫的通訊員偶然地乘車從可約漢到墨西哥城，偶然地與杜威及伐來爾同車。

「關於赫斯脫事件，」這位通訊員對杜威說：「我很知道赫斯脫報並沒有偷去托洛斯基的文章，如他所說的。我也知道赫斯脫報還承認買他寫的新文章吧！」

「但是托洛斯基說……」杜威沒有力量地說。

「我知道比較清楚呵，」赫斯脫通訊員插入說。

在所謂盤問的程序中，托洛斯基作了一個長而痛罵的的演說，稱一切美國的作家、畫家、知識階級和贊成蘇聯的人們，實際上是得到蘇聯的錢而這樣做的。他說，每年這樣的賄賂是很多的。他說，「新羣衆」(New masses) 是得到「蘇蘇」官僚政府的補助；他們因他們的行爲而得到很多的錢。」托洛斯基又說，「新羣衆」是「格伯烏的一個非正式機關。」(新羣衆財政

上完全倚靠牠的朋友們和美國的讀者。我們的賬簿由一位會計師按期審查，可以公開地聽人檢查的。——編者們。）

在休息期間，福雪告訴我們托洛斯基在這點上採取一個堅決的對立態度是很笨的。幾個與托洛斯基表同情的人，都告訴我們對於親蘇的美國智識階級和「新羣衆」的責罵，是無稽之談。在滑稽的反復考問的時候，托洛斯基的一個年青的同夥，他的名字據我們所知道的是斯陸夫或斯羅（Soroffor Solon）大聲的叫道：「我的上帝，他們把事情弄糟糕了，他們把事情弄糟糕了。」他知道弗勒蒂假裝着告發托洛斯基，而實際上是袒護他的方法使整個審問的一幕失去意義。他想補救這個情形，進行一個有類真正檢查的事情，斯陸夫或斯羅走到比爾斯的地方，向他建議發出某幾個有効力的問題。這個時候比爾斯覺得不高興，他說不願意多事。

審問中顯然的緊要關頭的來到，是當比爾斯這樣問托洛斯基的時候：「你在俄國握權的時期，那一年你討論到世界革命是不是要發生，俄國是不是能成爲一個單獨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呢？」

驚奇地，托洛斯基以十分溫柔的聲音回答道：「向來沒有討論到。」

「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吧，」比爾斯堅持地說：「鮑羅廷到墨西哥來組織第一次的共產黨，他說他是你的特使。」

「告訴通知你這個消息的人，他是一個撒謊者，」托洛斯基回答道。

比爾斯吃驚一下，微微地笑說：「通知我的人便是鮑羅廷自己。」

鮑羅廷問題的提出是有某種作用的，我們後來才知道星期五休會以後，弗勒蒂走到比爾斯的面前，責備他發出那個問題。弗勒蒂說：「你的問題是不相干的。」比爾斯指出幾乎一切「起訴人」那天所發出的問題，以及見證人的回答都與托洛斯基的意見有關係。比爾斯於是解釋他發出關於鮑羅廷問題的意義。他要表示托洛斯基從前實在是計劃一個世界革命。想用問題的方法找出托洛斯基現在與他的在蘇聯的黨徒們的關係是怎樣的。

「托洛斯基拿出他的著作來證明的他的理由，」比爾斯對弗勒蒂說。「他說我所講的鮑羅廷的故事是沒有根據的，我要將我的數年前發表的評論及鮑羅廷的文章給你看，來證實

所說的話。」

「那仍然是不切題的，」弗勒蒂堅持說。

「假使你真是托洛斯基的律師的話——我今天下午起始這樣地……，」比爾斯開始這樣說。

弗勒蒂發怒地插入道：「我不要和你講話了，除了委員會開會時我須和你講話。」

「你用不着煩惱，」比爾斯說。「你們這班人不知道如何已被托洛斯基拿在手裏玩弄呵……」

比爾斯以手抓着戴在他頭上的帽。納福勒蒂哭起來。斯脫堡說：「現在比爾斯……。」杜威面孔發白。以後我們發現比爾斯爲里瓦所說的一話而激怒起來。里瓦爲幾個出席的墨西哥人當翻譯。他告訴他們說，比爾斯所以發出麻煩的問題，是因爲「他得到了格伯烏的款子。」

四月十七日，比爾斯向委員會辭職，遞上這樣的一封信。

請接受我的堅決的解職。這個步驟對托洛斯基君，對委員會，對我個人都是很好的。我

杜威委員會「審查」托洛斯基案的真相

做了委員會的一員的主要原因，是給予托洛斯基君一個被控的人應有的機會以向世界表白這目的。以現在情形而論已經達到了。不幸我認爲本委員會的審查程序對於本案並沒有作鄭重的檢查。因爲這個以及其他原因，而且會已經開過，我認爲我的再參加是沒有用的。

比爾斯辭職以後，果爾德曼律師發表一個宣言，稱他與他的當事人固然贊成基于絕對的公正的理由，上來作檢查，而「他們不要莫斯科原告者的朋友，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擁護莫斯科所提出來的罪狀，以爲那罪狀是正確的或局部地正確的。」

托洛斯基對於比爾斯辭職所發表的意見，是我們想像得到的。他否認他與鮑羅廷有任何私人關係，他懷疑比爾斯個人的人格。他說，由於比爾斯的檢查，「可以發現一種新的材料，而這材料是有意造出來以，制止或我揭開莫斯科司法案的黑幕。」假使比爾斯自己不知道新陰謀的不與新陰謀發生直接關係的話，托洛斯基說，「他應該更快地作一切必要的解釋，讓委員會揭露陰謀的真實來源。」

果爾德曼與托洛斯基所發表的言論，是顯然地說「偵查案」不應該發出對「被告」不利的問題。托洛斯基也攻擊比爾斯說，他問起鮑羅廷問題，是對「偵查案」無關係的，我們中有幾個人當時懷疑着托洛斯基對於蘇聯的西班牙政策的批評「偵查案」又是否有一點關係。

可約漢的滑稽戲在美國的影響如何，我們不要去管它，而在墨西哥工人間的反應却完全是消極的。他們的普通感覺是托洛斯基在他家裏所舉行的「偵查案」是不能推行了莫斯科審案中所作的供詞。她僅給予托洛斯基在報館代表和一般組成所謂公正偵查委員會的朋友與黨派之前，以「印成許多許多國文字」的老套語。痛罵蘇聯的一個機會。

據墨西哥社會主義律師公會的總幹事瓦里拉(Luis B. Varela)稱，該會已指定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考察關於蘇聯審案的起訴和答辯了。這墨西哥第一流推事和法律學者所組織的機關，建議去旁聽三月間審問托洛斯基案，而被托氏拒絕了。理由是該會有幾個委員是共產黨。
墨西哥工人同盟 (Mexican Workers Confederation)主席托勒德諾 (Vicen

Lombardo Tichan) 曾對「新羣衆」通訊員解釋墨西哥工會不派代表出席托洛斯基審案的理由。他說：「墨西哥工人同盟有很高的地位與尊嚴，不能接受所謂邀請出席托洛斯基偵查案的請帖。」

四月十八日，比爾斯向報界發表一個聲明，責備杜威博士曲解他退去所謂公正審查委員會的意思。比爾斯聲稱，自命委員會的努力是在「審查」，「那是污侮了這個好的字。」比爾斯的聲明略謂「其它委員們自始至終崇拜着托洛斯基，便使調查的所有忠實的精神完全失敗，當我們的律師弗蒂勒君，完成他對托洛斯基的彎彎曲曲和毫無意義的審查時，這位「俄國的領袖」真真像在他肩上長上兩個翅膀。那時委員會一直所用的方法，簡單是一個小學生的惡作劇；我不願意再參與如此荒謬的事。那時一直沒有過審查，祇不過是一個同大家——除開我自己——的精美的茶話會，說些甜蜜的無聊的話。」

比爾斯聲明他的退出，對於托洛斯基犯罪與否並無關係。他說，他現在和他參加委員會時一樣是莫明其妙。他現在祇不過對委員會和它的「不堪的方法」給予一個公平的批判。

比爾斯說，杜威博士說我有充分自由向這個被控告的人發問，這話是不真實的。從剛開始審查時起，其它委員們和弗里德君就想出種種方法來制止我發問的自由。就在第一天，我的問題即被指為不正當。終結的盤問則有一種方式，即阻止對真情實事的任何探索，當研究我考問托洛斯基關於他的文件時，我的問題被認為是不幸，因為托洛斯基君回答得極壞；而且告訴我，不應向外面說他的文件大多數僅是抄寫本的事。其它委員再三打擾我的發問，以破壞它的實效。四月十六日的審查會，當我發問沒有完結的時候，杜威博士即宣佈散會，馬上又另召集一個會要我發問。審查的手續他們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對於以節省時間為理由而實際顯然是想遮飾真相，或顯然地是阻止我對於這位大師的嚴厲質問。我對這是不能同意的。關於審問的範圍與目的，也沒有徵求我的意見，因此我要公開表示不能贊同。

比爾斯說，在審判時期，委員會所保存的僅有的證據是某幾種關於巴塔可夫和羅姆事件的文件，而這些又不是都可靠的。比爾斯說，那證據以外，其他的證據是托洛斯基已經發表的著作，那在紐約可以買得到的或在圖書館內可以查得到的，用不着委員會勞而無功地跑到墨西哥。

哥來。

「反復考問，」比爾斯繼續說，「是讓托洛斯基以雄辯的和漫罵的音調來鼓吹他的宣傳，而他又很少能自圓其說。委員會的工作大部份是彌補托洛斯基君的律師對於托洛斯基案保障而力量不足的地方。」

比爾斯指出委員會給予托洛斯基五天半辯護他的案子，而詰問只有一天半。在詰問的一天中，弗勒蒂又費了大部份時間發出些「無聊的詰問，」他問起俄國革命的歷史與政治，在那像幼稚園的意味中進行着，各委員又對托洛斯基是這樣恭維的，使得這種審問手續爲任何有知識的人所竊笑。委員會的其他時間則化在不着邊際的，學問淵博的，關於辯證法及其他與莫斯科案無關的問題。他又說，沒有人是想來決定那案是有罪的或無辜的。

比爾斯問：「委員會工作的基礎既爲有威見的白螞蟻所蛀壞，我怎能找出托洛斯基的犯罪或無辜呢？」委員會在紐約語無倫次的發表報告是不能遮蓋他們在墨西哥已鑄成的錯誤。對於我個人如果我不辭職而發表少數委員意見的報告，那對托洛斯基君是一個大的冤屈。委員

會對他的害處，較莫斯科審案要來得更大。我腦中所記得的業經證明的托洛斯基的罪狀。爲判他從前已是現在還是那樣陰謀的一份子。委員會給我們社會一個不真實的報告，我不能再將我的名字列入孩子氣的事件中了。」

托洛斯基罵比爾斯爲「史太林的特派員」，他回答道：「托洛斯基知道我是委員會中僅有的不盲目欽慕他而望求得真相的一人。托洛斯基急急地說我是格伯烏的一員，他說每個不和他一致的人都是那樣的一員，當然他自己有那樣一個聰明頭腦的人自然是例外的，那表示他已有初期的慢性癲狂病了。在他的情形之下，他那種愚笨的責難不過是一種殘害心理的產物罷了。」

02172

民國二十七年一日初版

每冊實價三角五分

編譯者 樹 樑

出版者 大眾出版社

漢口交通路生成南里六三號

發行者 大眾出版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生活書店

經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華中圖書公司

新生圖書公司

449043



81